

社史研究

通讯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 主办

2018-1

SHE SHI YAN JIU TONG XUN



1925年，潘菽（后排左二）与芝加哥大学同学袁敦礼、蔡翹、吴有训等人合影。



1978年，潘菽（左三）与高觉敷（左二）陈立（左四）等人出席中国心理学会杭州会议。



1983年12月，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合影，前排左起：金善宝、严济慈、周培源、许德珩、潘菽、茅以升；后排左起：赵伟之、安振东、柯召、孙承佩、徐采栋、郝诒纯。

封面题字:韩启德

二〇一八年第一期(总第15期)

主 办: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

主 编:王元丰

本期编辑:管建军 於 亮 段正初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社史研究 通讯

SHE SHI YAN JIU TONG XUN

目 录

Contents

第四次社史培训班专题

03 在第四次社史研究培训班上的讲话 / 邵 鸿

06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工作十年规划(2018—2027)

08 上海社史工作的实践及思考 / 季 平

09 “九三学社人物丛书”项目取得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 / 管建军

11 编写《湖北省九三学社史》增补版的体会 / 赵谦璟

13 社史编修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 段正初

社史资料选登

16 九三学社历次代表大会简辑 / 侯艳华

18 潘菽日记与交心

28 北京分社早期社员名录(四)

专题研究

32 褚辅成史料搜集、研阅回顾 / 王天松

35 九三学社创始人张迦陵史料片段 / 邢克余

39 浅析建国前储安平政治转向的原因及程度 / 於 亮

昨天与今天

44 一部组织政策文件的存废历程 / 但 勇

47 亲和敦睦的税氏家风 / 郭 祥

目录

Contents

社史人物

49 王淦昌 (1907—1998)

49 王养冲 (1907—2008)

50 刘建康 (1917—2017)

50 陈吉余 (1921—2017)

消息与动态

51 黄险波荣获 2017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创新奖

51 央视推出《王选：方正之士》专题片

51 九三学社中央授予王贤才等 10 名同志“九三楷模”荣誉称号

51 九三学社省级组织换届画上圆满句号

52 九三学社中央举办第四次社史研究培训班

52 九三学社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胜利召开

在第四次社史研究培训班上的讲话

邵 鸿

同志们：

在社的十一大即将召开之际，我们聚集在北京，举办第四次社史研究培训班。本次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总结一年来的经验与成绩，各地充分交流、借鉴相互的收获与体会，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推动全社史研究工作再上新台阶。

下面，我对一年来全社社史研究工作进行一个简要的总结，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以供大家在会议上讨论。

一、过去一年工作的总结

2017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十月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再过几天，我社将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谱写九三学社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今年还是九三学社的换届之年。从4月开始，我社省级组织换届工作全面展开，目前，所有30个省级组织换届圆满结束。这次省级组织换届工作，与2012年相比，领导班子规模基本不变，但调整幅度较大，新任主委、副主委接近总数的一半。虽然本次换届调整面大，但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换届工作规范有序、风清气正，取得圆满成功。所有主委、副主委候选人均高票当选。经过这一次换届，全社省级组织领导班子结构进一步优化，特别是一批政治素质高、代表性强的同志和社务工作者走上省级组织领导岗位，增强了社的领导力量和组织活力，为未来全社各项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史工作也将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过去一年里，社史工作按照既定部署，有序推进，取得了新的成绩。

一是继续扎实推进社史工程。稳步拓展“九三学社人物丛书”项目。在前期出版15部传记的基础上，今年我们又陆续出版了《薛愚传》、《李埏传》、《涂长望传》等3部书稿，总数达到18部。持续开展“九三学社口述史”项目，完成陶夏新、王泽农2人口述史采录。定期出版

《社史研究通讯》，保持每年两期的出版频率，目前已经出版一期，第二期也即将出版，为社史资料刊发、社史研究者的交流和切磋提供了重要平台。积极举办社史研究培训班，加强对社史工作的重视，着力提升社史研究骨干人员的学术素养和业务能力。

二是制定《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工作十年规划（2018—2027）》。明确了社中央今后十年社史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要求进一步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整合力量，继续推进“社史工程”各个项目的深化与完善，利用“社史工程”已有成果加大社史教育和宣传工作，广泛收集社史资料，围绕社史重要事件和人物开展研究与纪念活动，把社史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台阶。

三是社史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新成绩。社中央充分利用网络数据库资源，购置社史研究必备的工具书，系统收集社史电子书，继续关注社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进一步挖掘和整理社中央档案室，如五十年代的社员登记册等重要史料。除发掘社中央档案材料外，研究室的同志多次到国家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查阅报刊和档案资料，在收集资料的同时，为下一步系统的整理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在去年的社史培训班上，我们提出了几个要重点突破的领域，如早期社史的若干重要问题、重点人物研究、社员群体研究等等。仅仅一年，我们就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如社河北秦皇岛市委邢克余同志，广泛收集我社创始人张迺陵的史料，重现了长期被埋没、忽视的重要社史人物的人生片断，填补了社史研究的空白。复旦大学周国民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系统梳理了颜福庆、谷镜汧、王有琪、赵乐事等九三前辈推动上海市遗体捐献工作的历程；青岛理工大学张大英副教授，按照九三学社历史的发展阶段，分三个时期全面展现了九三学社的语言文字工作者群体的基本情况；在社中央从事宣传工作的刘华，利用八一建军节的契机，梳理了程开甲、陈芳允、王淦昌、吴阶平、方亮等加入军队或穿过军装的社员群体，虽然遗漏了涂

长望等重要社员,仍是很有价值的尝试。

四是参与编修民主党派史志,审订地方组织社史。一年来,社中央研究室同志参与《统一战线人物志》丛书修编工作,完成吴阶平、王文元人物志初稿。与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共同编写出版图书《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引导社员重温历史、弘扬传统,夯实团结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审看了即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国的民主党派》文献片九三学社分集,为完善修改提供反馈意见。

此外,还先后审订了海南、湖南等地方组织编纂的九三史志,应邀到多地宣讲九三学社历史。

五是抓住契机,积极举办与社史有关的会议和纪念活动。例如,开展吴阶平诞辰100周年、王选诞辰80周年、潘菽诞辰120周年等纪念活动,充分利用《社史研究通讯》平台,通过纪念专题、图片合集等方式,立体展现社史人物的生平、功绩。通过这些纪念活动,既缅怀了九三先贤们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又弘扬了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

六是地方组织社史工作成绩喜人。上次社史培训会后,许多地方组织都在筹备编写本地九三学社史、九三学社志,撰写本地九三人物传,开展口述史工作,并邀请社中央前来宣讲社史。譬如,社上海市委出版了《九三学社上海先贤(第一辑)》,先期收录了褚辅成、卢于道、宣移今、谭其骧、卢鹤绂、颜福庆等二十五位先贤人物,图文并茂、史料翔实。社上海市委换届后,《九三学社上海先贤(第二辑)》也已经在筹备之中。社海南省委精心编纂的《海南省九三学社简史》即将出版,在审读中,我们发现《海南省九三学社简史》结构严谨、资料丰富、特色鲜明,可读性很强。社湖南省委充分利用最新史料,悉心编纂了《九三学社湖南简史》,也即将出版发行。

社中央的社史工作,离不开地方组织的支持,譬如人物传记、口述史采写、社史资料收集、社史研究,大部分都是地方组织、各地社员参与完成的。

七是全社会普遍开展了社史的学习和培训。各地大力开展九三社史培训学习和各种传统教育活动。通过社史培训和传统教育活动,使广大社员了解了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历史,增强了广大社员的政党意识、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起到了凝聚力量、提升思想境界、推动工作的良好作用。

总之,过去一年里,我社的社史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时也应看到,我们的工作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特别是,社中央对各地的指导与规范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社史研究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研究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提升,研究成果的运用、宣传、展示还有很大努力空间,各地社组织之间的交流借鉴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等。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是今后我社社史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

二、进一步加强社史研究工作的意见

社史是加强九三学社优良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是推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重要工具。社史作为我社很有特色且富有成绩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永远没有穷期。具体来说,以下几项工作要在今后扎实推进。

一是进一步加强规划,制定行动指南。从社中央来讲,研究室在上次社史培训会之后,通盘考虑,研究制定了《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工作十年规划(2018—2027)》,作为今后社史工作总的指导方针。这次培训会,也希望大家对《社史研究工作十年规划》充分讨论,畅所欲言,以便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从地方组织来讲,完成换届后,也要制定五至十年的大致规划,明确今后一段时间本地社史的工作,明确与社中央配合,做些什么工作,出怎样的成果,实现这些计划目标,需要哪些保障措施。“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么多年来社史工作实践证明,做好规划是社史工作最基本的一项工作;没有规划,社史工作不太容易有大的成绩。

二是进一步加强社史研究工作机制建设。社史工作要配备好三支队伍,即用好专职队伍,整合全社力量,借助社会力量。在社史工作中,规划是关键,课题是动力,组织机制是保障。从上下来讲,社中央要进一步加强对社史的规划、指导和推动,如资料的收集、整理与保存;加强社史工作的督促与检查,同时,要通过更多的鼓励与奖励,发挥课题的设计、引导、带动作用;除了地方自报,社中央还要制定些指南性的文件;发挥社史研究中心的作用,要调整人员,更多地吸收地方社史研究人员,调动各方面人员的积极性。横向来讲,是多方的合作,我们人手不够,可以做组织者,要以项目为纽带,推进上下左右人员的合作、单位的合作,如与大学、科研院所的合作;争取党派之间的合作,一方面是研究方

法、机制的合作，另外，各民主党派早期的交叉程度非常高，研究社史必须对其他民主党派的历史有所了解。

三是抓住重要，争出精品。九三学社人物丛书，是社史工程的一大重点。各级社组织要加强重视，配合作者获得传主原单位的支持与家属的理解，写出高质量的社史人物传记。

目前，各项重点研究虽然有了进展，但研究力量仍然薄弱，成绩仍然不够，可以突破、拓展的领域还有很多。譬如，在社员群体中，许多领域都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九三人，如地质界的黄汲清、谢家荣、郝诒纯，杨遵仪、杨起等人；民国时期一大批非常著名的法学家，建国后被时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许老动员加入九三，参与法律委员会的工作，如戴修瓚、李祖荫、王之相、韩德培等人；此外，古生物学界、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都有一大批值得研究的著名社员。我们人员有限，要集中力量，抓住重要人物和社员群体，做好重点研究工作。

这里再重点强调一下社史资料的收集：一是口述史资料。口述史工作不能松懈，要下大力气抓好。很多历史资料不及时抢救，就会永远失去，各地一定重视，哪怕一时出版不了，也要保留下来。二是档案的收集。由于情况特殊，察看档案有些不方便。但档案记载的历史，比正式出版的书面历史更丰富、更生动，也更有启示意义。在档案收集方面，只要肯下功夫，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三是民国时期报刊资料的系统收集。这是一项繁而不难的事情，花了时间，用笨功夫去做，就一定要有收获。可以由社中央社史处牵头，全社分工，把民国报刊里头关于九三学社社员资料逐渐收集起来，汇聚成一个社史研究数据库。在收集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已有的电子期刊数据库。四是实物资料的收集。要借助换届的东风，启动实物史料的收集工作。一方面为今后办好高质量的社史陈列馆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我们编修社史提供方便。

四是利用好发挥好九三学社全国传统教育基地的作用。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基地的宣教载体作用，扩大基地的影响，宣传普及社史知识，提高社员们对社史的感性认识，增强社史宣传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提高社史研究成果的转化利用水平。我们要根据全社实际和申报情况，继续命名适量的新的传统教育基地。要

积极探索社史宣传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力求使宣传内容更加广泛，形式更加多样，效果更加明显。特别说明一下，浙江湖州的梁希纪念馆做得很好，但接待工作一多，也存在一些困难，希望浙江支持一下，克服困难，别把好事变成包袱。

五是搞好重大历史节点和重要人物的纪念活动。组织好重大历史节点和重要人物的纪念和宣传，大力弘扬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既是社史研究部门服务大局的重要职责，也是扩大社史工作影响力的重要机遇。社史研究部门要根据社中央确定的宣传主题和工作计划，在头一年末对次年的重大纪念活动进行一次摸排，把那些需要进行纪念和宣传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社史人物分别细列出来，做好规划和安排，列入工作计划，使这些重大纪念活动与宣传工作、社史工作及其它社务工作有机衔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要围绕重大节点或重要社史人物的纪念活动，充分利用社的网站和刊物等现代媒体，采取召开座谈会、理论研讨会，举办专题讲座，开展社史知识问答，征集并刊登纪念或研究文章，拍摄专题短片，制作社史宣传网页，发放社史书籍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社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活动，不断扩大社史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从而取得宣传教育效果。

同志们，社史研究工作是一项长期、可持续的工程，穷其渊源，究其流变，全面呈现我社的发展历程，记录社史人物的抉择、行止，促使全体社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但社史研究也不是一项可以轻易做好的工作，古人说，做好历史研究需要才、学、识兼备，社史研究也不例外。

希望大家群策群力，继续努力，促使社史研究再上台阶。谢谢大家。

（本文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工作十年规划 (2018—2027)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

为明确社中央今后十年社史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社史研究工作,努力发挥社史研究工作在全面推进九三学社自身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现制定2018-2027年社史研究工作规划。

一、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

今后十年社史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充分发挥社史研究工作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更好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服务,为我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履行职责服务。

今后十年社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整合力量,继续推进“社史工程”各个项目的深化与完善,利用“社史工程”已有成果加大社史教育和宣传工作,广泛收集社史资料,围绕社史重要事件和人物开展研究与纪念活动,把社史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台阶。

二、社史研究工作的十年规划

十年来,社史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社史工程的主要项目整体进展顺利,社史资料得到广泛收集,社史研究取得丰硕成绩,社史的宣传应用得到深化拓展,地方社史工作广泛开展,机制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未来十年,我们要重点对已启动的项目不断深化,对未启动的项目加紧落实,保证“社史工程”顺利进行,促进社史研究工作迈向新高度。

(一)继续推进“社史工程”

2007年,“社史工程”正式启动。十年来,“社史工程”总体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未来十年,要进一步整合全社力量,力争使“社史工程”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一,继续推动“九三学社人物丛书”的出版,争取做成精品,形成品牌效应。“九三学社人物丛书”是“社史工程”中最基础的一个工程,同时也是一个长期工程,目前已出版18种。在今后的十年,计划每年出版3-5本,精益求精,确保质量,达到保存历史、

宣传九三杰出前辈、教育和启迪社员及读者的作用。第二,继续开展口述历史项目。口述历史资料是珍贵的社史史料,能够记录老同志亲历的重大事件和变革,需要抓紧抢救,否则很多事件就将成为历史悬案,留下永远的遗憾。2012年,口述历史项目正式启动,首批22个中标课题已经结项;2016年,第二批口述历史项目(2016-2018)确定6个中标课题,正在开展当中。今后十年,计划每年完成2-4个质量较高的口述史课题。第三,继续提高《社史研究通讯》的办刊质量,发挥刊物的平台和纽带作用。2007年,《社史研究通讯》创刊,目前已出版14期,对全社积极参与及推动社史研究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今后十年,《社史研究通讯》要保持每年两期的发刊频率,继续挖掘和整理社史资料,鼓励突破性社史研究,也要不断扩大稿源和读者群,做好刊物宣传,为发现和培养社史研究人才提供渠道。第四,合作办好重庆社史陈列馆,积极征集社史文物,适时启动社中央社史陈列馆项目。我社召开成立大会的会址,重庆青年大厦,将设立一个展现九三学社历史的陈列馆。社中央、各地方组织要与重庆市委通力合作筹办好这个陈列馆。社中央启动社史文物的征集工作后,将组织专人到各地社史组织征集文物,并建立文物征集、保存的相关制度,以便长期进行。社中央社史陈列馆场将以实物、图片和文字等展现我社的历史进程,使之成为社史研究和宣传的资料库和重要平台。

(二)着力开展社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研究

十年来,社史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了《九三学社史话》、《九三学社人物传略》(第一辑),完成了体现最新社史研究成果的《九三学社简史(2015年修订版)》。今后十年,要争取在重点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有待突破的重点领域包括:早期社史的若干重要问题,如民主科学座谈会的真实情况,九三座谈会的作用,中共在社组织成立前后的历史作用,九三学社与小民革的历史关系问题,等等;重点人物研究,如许德珩、吴藻溪、王造时、孙荪荃、孟宪章、陈宝谔、孙承佩等重要创始人、旗帜性社员的研

究,有待填补空白、深化拓展,九三楷模,以及地质界、法律界、社会学界等社员群体也值得研究;建国以后社史的若干问题,如1956年的组织大发展、“反右”与“文革”期间的九三学社、改革开放初期的九三学社、九三学社履行政党职责的历史研究,等等。

(三) 加强社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目前社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取得了一定成效,社中央社史资料室收藏了一批珍贵的社史资料,包括重要创始人家属捐赠的原始档案、早期社员花名册、入社登记表、早期组织史资料、知名社员手稿、书信,等等。今后十年,将提高档案意识,前往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收集历史档案,充分发掘我社前辈的日记资料,系统收集民国报刊杂志资料,充分利用电子文档、电子数据库等信息化资源,继续收集和整理社史资料,编制社史资料目录,为夯实、提高社史研究水平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待条件成熟后,出版反映社史资料收集新成果的《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二)。

(四) 强化队伍建设,提高社史研究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高水平的研究队伍,是做好社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今后十年,我们要争取搭配好三支队伍。一是配强用好专职队伍。社中央和省市各级机关要通过选好、引进人才,加强对在职人员的培养等多种途径培养研究队伍,通过制定学习和研究规划,参与和承担课题研究来给他们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提高他们的社史知识和研究能力。二是整合用好全社力量,通过培训讲座、社史研讨、承担项目等多种形式,在九三社员中发现和培养一批有能力、有潜质的社史研究骨干。要充分调动社的各级组织的积极性,发挥各级社史研究中心或小组的作用,使组织优势得以实现。三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加强与有关部门(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北京档案馆等)、各兄弟民主党派和高校、党校、社院、社科院等单位的横向联系和交流,积极参加有关学术活动,联合或委托进行课题研究,推动社史工作的深入开展。

(五) 加强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的工作,提升社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2009年社史研究中心的成立为社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重要平台,鉴于本中心研究人员都是史学、文博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社内对社史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的人员,充分调动和发挥研究员的热情,将极大提高社史研究的质量和水平。社中央将确定社史中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和重要人物通过邀请研究员分担课题针对同一问题召开研讨会,邀请个别研究员结合专长开展学术讲座等形式,充分发挥

研究中心的作用。

(六) 加强社史研究成果的宣传应用,更好地服务自身建设

2007年以来,社史的宣传应用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制作和下发了社史专题片,广泛开展了社史宣讲活动,命名首批共20个“九三学社全国传统教育基地”。今后十年,我们要围绕重大历史节点或重要社史人物的纪念活动,充分利用社的网站和刊物等现代传播媒介,采取召开座谈会、社史研讨会,举办专题讲座,开展社史知识问答,征集并刊登纪念或研究文章,制作社史宣传网页,发放社史书籍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社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活动,不断扩大社史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社中央还将根据全社实际和申报情况,继续命名适量的新的传统教育基地,争取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基地的宣教载体作用,提高社员的自豪感与归属感。

(七) 加强对地方社史研究工作的指导

社中央将利用完成《九三学社简史(2015年修订版)》的契机,对省级地方组织正在编写的社史、社志进行审订,以提高编写水平,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社史社志工作体系;将深化社史的辅导工作,完善宣讲九三学社历史的PPT模版,普及社史知识,加强宣传和引导,增强社史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为各地方组织进行新社员社史教育活动提倡便利。各地社组织要与社中央研究室保持密切联系,定期交流汇报社史研究工作和交送社史研究成果和资料。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社史研究应朝更专业化、更集成化、更高水平的方向去努力。经过十年积蓄,到2027年底,全社社史研究工作将取得较丰实的成果并达到一个新的层次:在制度设施方面,形成较完备的社史研究制度,包括资料文物的整理、保存,研究课题的确定、招标、评审,研究人员的职责、奖惩,研究经费的申请、使用等;在人才队伍方面,有效整合社中央与地方组织、社内与社外研究力量,形成一支专兼结合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在资料收集方面,广泛收集记载重要社史事件与社史人物的档案、报刊、手稿、著作等,进行系统分类、整理,基本满足社史交流与研究的要求。从而为下一阶段编撰一部全新的《九三学社简史》,为将来形成一部完整、科学的《九三学社全史》创造条件,为全社社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三、条件保障

1、经费支持

通过继续申请财政专项和适当资金安排,保证“社史工程”的基本经费需求。进一步改善办公和调研的手段和条件,加强信息化建设和档案、图书资料建设等。对中标课题的承担者,保证经费支持。

2、人员保障

社中央研究室已有三名社史研究工作专职人员。今后将继续明确分工合作,确保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提高社史研究水平。省级组织有条件的可设一名社史研究工作专职人员,不能设专人的,应明确一人负责社史研究

工作。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聘用编外人员专门从事社史研究工作。

3、会议与培训

今后仍坚持每两年召开一次社史研究工作研讨会,举办一次社史研究工作培训班,开展专题研讨,部署和协调全社的社史研究工作。调研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尽量多到地方组织和社员家中进行调研和访谈,了解和检查有关情况,指导基层工作。

上海社史工作的实践及思考

季 平

社史研究是一项长期、繁杂的基础性工作,需要持续的时间和精力。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工作要求,以及服务自身建设、服务履行职责的工作理念,按照社中央的总体部署,结合社上海市委的工作安排,我们认真组织,精心安排,做了一些工作:

1. 组织开展社史专题研究

社史研究是围绕人和事件来进行的。近年来,我们承担社中央社史人物研究工作,在大量史料收集核实的基础上完成《宣移今传略》和《卢于道传略》。每年开展社市委社史课题研究,先后完成《孟宪章与反美扶日运动》《九三社员在遗体捐献工作中的历史贡献》课题等,其中《孟宪章与反美扶日运动》一文被上海市档案馆收录。通过参与社中央、上海市政协等有关单位组织征文和论坛活动,先后撰写了褚辅成等多位九三先贤的史料研究文章8篇。结合学习实践活动,组织开展上海九三先贤的史料收集整理,出版《九三学社上海先贤(第一辑)》一书,此书得到韩启德主席的赞誉,也深得社内青年人及广大社员的喜爱。

2. 做好口述历史工作

口述历史是收集史料的一种良好途径,既能专业化也能大众化,既有鲜活感也有历史感。围绕纪念建社70周年,我们先后花了二年左右时间在各基层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口述历史工作,邀请专家作专题培训,采访各基层尚健在的老领导老社员,记录各组织在发展过程

中有影响的人物和事件,编写出版了近30万字的《九三学社上海基层组织口述历史专辑》,此项活动广受好评,被誉为最好的接受社史教育活动之一,从历史角度加深了广大社员对参政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理解。其次,我们还承担社中央口述历史课题4项,整理有关材料10余万字,拍摄录像18小时,采访相关人物30余次,查阅核实有关档案20余次。第三,开展历任社市委领导的口述史工作,完成4位老领导的口述采访,整理成文近5万字,并做好实物、照片等有关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第四,协助基层组织(如纺织委员会、金山区委等)开展专项口述历史工作。

3. 开展合作研究

经社中央牵头,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合作开展了“九三学社上海早期历史的研究”。此项工作不但理清了部分存有争议、原先不太清楚的上海九三早期历史,还先后采访了社内外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有关人员10余次,整理档案材料20余万字。通过学习交流,提升了我们社史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4. 拓展社史研究平台

为了更好地推进社史研究工作,我们积极探索各种方法,将社史研究工作与社志编撰工作相结合,与社市委及基层组织大事记工作相结合,与专题纪念活动和报告会相结合。例如为纪念建社70周年,我们与民盟、民建市委联合举办“纪念褚辅成、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访

问延安 70 周年”座谈会，共同探讨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and 现实思考；与上海交大医学院合作开展著名微生物学家余贺生前实物展；参与纪念著名流行病学家苏德隆诞辰 110 周年相关活动等；还先后邀请专家学者举办历史研究报告会 4 场。

5. 推动社史研究成果的转化

一是将社史研究的成果与基层组织以及广大社员交流分享，做好社史的宣传教育活动，先后举办社史研究报告会 8 场。二是利用社史研究成果为社内外提供社史资料的服务工作。例如为一些专题片的拍摄、纪念馆史料陈列、社会各界涉及九三人物和事件的资料核实等提供帮助。三是参与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市社院、市社科院等单位各类历史研究工作的研讨与交流。

6. 努力做好《民主党派分志》（九三学社篇）编撰工作

2012 年起由上海市委统战部牵头的《民主党派分志》（九三学社篇）工作进入启动阶段。通过走访社中央、市人大、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市档案馆、图书馆（包括有关高校图书馆）等地查阅档案，召开资料征集会，采访相关人员等收集资料与社内省级组织及兄弟党派开展交流探讨等多种方法，不断完善和提高修志工作。6 年来，根据编撰的总体要求，《民主党派分志》（九三学社篇）工作已完成概述、所有五个章节初稿、1978—2012 年大事记、人物传略和人物简介、照片以及资料长编等内容，累计 120 余万字。参与上海市方志办各章节节点评会、民主党派分志编委会内审会、老同志征求意见会以及各类研讨会 30 余次。社市委修志工作多次获

上海市方志办领导、市委统战部领导的肯定和表扬。此外，还完成《汶川特大地震上海市救灾援助实录（九三学社市委）》《上海世博志》等编撰工作。

7. 重视社史研究人才队伍建设

做好社史工作人才是关键。2012 年社市委成立“理论和社史研究中心”，今年社市委换届，成立了“社史和理论研究工作委员会”，形成了一支稳定的研究力量。此外，在日常活动中还不断积极吸收对社史研究感兴趣、有能力的年轻社员参与，为他们搭建平台，形成社史研究人才“新老并重”的良好局面，使研究工作后继有人，研究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新形势新任务对社史工作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有以下一些方面值得加强和思考：一是提高认识，提升水平。要进一步增强社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做好新形势下社史工作服务自身建设、履行职能的探讨研究，社史工作与参政党理论研究相互促进的研究，社史工作的制度性和内在规律性问题的研究；二是社史研究要做到既着眼宏观又重视微观、既深入调研又广泛阅读、既全面客观又严谨细致，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很多方法需要探索。

我们将认真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社十一大要求，在社中央的指导下，各省级组织的帮助下，继承传统，不忘初心，把握思想主线，突出工作重点，提升研究能力，推动成果转化，为不断做好社史工作继续努力。

（本文作者为社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

“九三学社人物丛书”项目取得的 经验和遇到的问题

咎建军

“九三学社人物丛书”项目，已经陆续出版的总数达到 18 部，还有 10 部左右在编写过程中。总结这些年的经验，我们取得的成绩是空前的，编写“九三学社人物丛书”，给我社先贤树碑立传，发扬传统，激励后来，

意义深远。按照我们的目标，将来出版百位甚至更多人物丛书，这将是我社社史工程的一件大事，但是只有质量好，读者乐意读，所出传记有价值，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才是成功的关键，也才有意义。总结这几年人

物丛书出版的经验,主要有这几点:

一是社组织的重视。比如《薛愚传》,社北京市委副主委亲自抓工作,组织得力干将,数次召开座谈会研究和解决遇到的问题,拨出专门经费支持相关工作。并与薛愚家属、薛愚原单位组织取得联系,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使《薛愚传》得以如期顺利完成,而且质量较高;再比如《王文元传》,中共黄陂市委专门拨经费予以支持,经全国政协沟通,作者高裴才同志赴多地调研,为写好王文元传打下牢固的史料基础。这些年,很多地方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当地先贤,如果我们能和地方政府联手,双方协作,将极大推进该项工作。前不久,中共泸州市委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专程来访邵鸿常务副主席,就编写好《税西恒传》和税西恒纪念馆等事宜进行洽谈,双方就合作事宜达成共识。“九三学社人物丛书”项目是全社的一件大事,各地方组织的支持和配合是项目顺利进展并取得成绩的关键。请各地方出主意、想办法、动员积极因素,让我们共同把这项九三学社的历史工程搞好。特别是牵涉传记作者到本地调研、了解有关史料,请各地予以支持;

二是必须得到传主原工作单位的支持。九三学社先贤多有其主业,作为九三学社成员,今天他们为我们立传,弘扬他们的精神,鼓励更多九三人不忘初心、继往开来,所以写好他们的传记,必须熟悉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另外,我们有的科学家所做的事业属于国家重要工程,涉及国家安全领域或政治秘密,哪些可以写?哪些不能写?这都有严格的保密原则,把握不好,会出泄密问题,对九三学社来说,就是政治把关上不严谨,所以必须与原单位密切合作!比如《赵九章传》,经过我们的联系、沟通,就得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大力支持,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地球物理所还组织相关熟悉当时历史的老同志座谈会,回忆某些细节,成为我们写传记的珍贵资料;

三是得到家属的理解。家属的支持是人物传丛书顺利进展的重要因素,不少家属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吴藻溪之子吴维扬就提供了父亲生前的大量文字和图片资料;《李埏传》由李埏之子李伯仲、李伯杰亲自写作。但也有家属怕传记写不好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本着宁可写不写的原则。有的家属执意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写,不考虑书的政治意义、社会影响、历史真实。这就需要我们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工作。总之,九三学社人物传工程,牵涉范围广,面临巨大的协调动员工作,也

是对我们工作能力的一个检验,我们的工作热情更是对前辈功德的赞美与敬仰,只有怀着虔诚与敬仰之心,踏踏实实、克服困难,写出几部好的传记,能影响更多的人,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才可谓不忘初心,才更加砥砺奋进!

遇到的问题:

一是查阅资料的困难。近年来,社会上由于一些人撰写政治历史人物或叙述有关历史背景时,没有把持严肃认真的历史观、政治观,甚至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事情大书特书,只注重眩人耳目;有的作者凭想象编故事;甚至有的作者连资料都不查阅,任意写。这些现象,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另外,现在各级档案馆都对档案严格管理,查阅档案资料手续严格而且审批程序繁杂,给我们撰写人物传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如何解决,还请我们大家出主意想办法;

二是选题的问题。目前我社先贤中一些重要人物还没有传记,或者我们还没有立项,这主要和掌握的资料有关。如果我们回避这个问题,即便我们写出几十部传记,那我们也会非常遗憾,人家会问,为什么有的重要人物你们不写呢?所以那些在九三学社历史上、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功绩的先贤,我们应该克服困难,把他们的传记写好,也应该是我们选题的首选。学苑出版社也提出建议,要集中力量把影响巨大的人物的传记作为首选,要集中精力写几部精品,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在销量上有好佳绩。明年我们就要征集新一批传记项目了,请大家勇于知难而上,把这个作为选题的首选!

三是经费问题。目前我们出一部传记,支付作者的经费是税前3万元、支付出版社出版费用5万元。支付作者的经费不算高,因为写传记不是写小说,写小说可以坐在家编,写传记要出差要调研要买资料,在外面工作还得吃饭,所以有的作者给我反应写一部书亏了。由于社中央经费有限,也请地方组织,根据自己的经费状况给当地社员中承担社中央项目的作者予以支持,特别是写本地方组织的九三先贤的作者。这个还没有固定的方式和经验,我们相信办法总比问题多,只要各地领导重视,总能有办法给予作者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时间关系,我就谈这些,也欢迎各地方组织领导和同志们就该项工作、就社史工程给我们提出好建议好办法。众人拾柴火焰高,让我们把社史工程搞得更好,做出突出的成绩,写出优秀的作品!

谢谢大家!

附录:

2013 年前, 已出版的十部人物丛书是:

- 1、《王选传》.....丛中笑
- 2、《杨樾传》.....刘长水
- 3、《陈学俊传》.....李 红
- 4、《谢立惠传》.....陈义华、郭 祥
- 5、《张雪岩》.....陈建明、王京强
- 6、《王卓然》.....王太学
- 7、《冯沅君传》.....赵海菱、张汉东、岳 鹏
- 8、《张玺传》.....薛 原、胡修江
- 9、《陈恩凤传》.....王 琦、李严冬
- 10、《王习三传》.....李 琳、梁晓辉

2017 年底前已出版的八部人物丛书是:

- 1、《褚辅成年谱》(上下册).....王天松
- 2、《杨振声年谱》(上下册).....季培刚
- 3、《侯宗濂传》.....马欣、赵 晏、王向辉
- 4、《潘菽传》.....沈重光
- 5、《唐亚伟传》.....江 暖
- 6、《李埏传》.....李伯杰
- 7、《薛愚传》.....孔瑶竹
- 8、《涂长望传》.....《涂长望传》编写组

(本文作者为社中央研究室社史研究处处长)

编写《湖北省九三学社史》增补版的体会

赵谦璟

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在社史研究工作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前辈们经过几届的努力, 从 1995 年起, 就着力进行了对社史的研究并编纂出版工作。几经修改, 《湖北九三学社史》, 于 1995 年正式出版, 当时是省级组织中正式出版社史最早的。时隔十年后, 社省委又在 2005 年集中力量在原基础上对《湖北省九三学社史》进行了补充、修订, 再度出版了《湖北九三学社史》新版增补本。这两本社史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湖北九三学社自 1955 年建立至 2005 年的 50 年间, 湖北省九三学社各级组织的历史面貌和发展历程。

回顾这些年湖北九三在社史研究方面的工作, 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成果, 然而相对于湖北九三风风雨雨的五十年历史而言, 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对于社史研究, 作为做具体工作的编写人员, 体会有以下几点:

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关于社史研究工作, 领导重视是非常重要一环, 特别是在地方组织, 这不仅仅是哪个人, 哪个部门能完全胜任的工作, 需要多方协同, 多部门协作才能完成的事业, 几届社省委领导都一直保持着高度的重视和热情, 在人力、物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 给予了社史编辑最大

的支持。

我们在编撰的过程中得到了多方的支持。

1、九三学社中央的支持。吴阶平、韩启德、胡绳、俞正声等都为此书题词。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更是为社史题写了书名, 题词的还有郝诒纯、金开诚、钱运录、王生铁、苏晓云等。我们历届主委都十分关注社史的编纂工作。尤其是老主委刘建康院士, 郑楚光主委, 他们在百忙之中不仅认真回顾历史, 把自己作为一个老社员的所见所闻提供给编纂人员。

2、省委统战部的支持。社史的编纂涉及到许多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中共统战部的审稿和统一出版是必要的一环。在审稿的过程中省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每天下班后到机关参与文字的把关审核, 一起吃盒饭, 一起熬夜。统战部副部长最后把关, 进行终审。

3、基层组织的支持。在社史中每个市级组织和基层委员会都要写简史, 我们有 9 个市级地方组织, 6 个基层委员会, 要动员和组织他们参与社史的撰写, 最好的办法是做一个模块, 做一个框架, 统一格式, 限定数字, 发给各市委和基层委员会, 得到他们的支持。

4、社内外专家的支持。在社史的编撰过程中也得到许多专家的支持, 比如封面设计, 我们请社外专家帮忙设计, 即要体现九三特色又要具有美感, 在出版方面也

得到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5、社省委机关的支持。在人力、物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给予了社史编辑最大的支持。

二、把握主线,遵循规范

把握社史研究的两条主线: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历史;对九三学社政党特色及其不断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优良传统的研究。

遵循基本学术规范,提高品质。尊重历史事实,要做到“秉笔直书”,所写的内容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写史第一追求的就是“信史”,就是历史的真实性。

新旧两版社史在程序上,我们分别成立了编委会和编写组。编委会的职责:审定编辑提纲和方案、研究编辑中出现问题、指导编写人员进行工作。编写组是在编委会指导下进行编写工作。

编委会中,主要的是要选好主编,选择有历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我们选择是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陈锋同志作为主编,他对历史研究的学术专业和丰富经验为社史的编纂和顺利出版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主编主要统筹全书的框架结构。副主编既有负责机关工作的副主委,也有专门负责相关工作的机关干部。编委会中还吸纳了许多能为社史研究提供信息资料或者在编纂方面有突出能力的相关人员。编写组都是机关专职,包括市委专职,分工明确、队伍强大的编委会保证了社史编纂的顺利进行。

两版社史编撰出版都借助了建社整数周年的契机。

《湖北省九三学社史》初版于1995年,再版于2005年,分别时值九三学社建社50、60周年。为隆重庆祝,社省委安排部署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都将社史的编撰和出版发行作为纪念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这样可以在人力、物力上得到保证,旧版我们当时是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新版我们是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书号贵一些,但质量更好。

三、立足总纲,纲举目张

总纲是总的纲领或者总的纲要。是编写的总提纲,总提纲分章、节、点。顺着时间的脉络先分出章,再列出节、点。

在分章节时主要以时间为轴线,以界别为分水岭,特殊时期可增加章节。以编写新版《湖北省九三学社史》为例,在编委会大家讨论的基础上,确定为十章节,再根据不同内容列出节,一般一个章节分四到六节,节中

可根据不同情况分成点。这样形成总编写提纲。

提纲完成,最后是附录,附录是附在正文后面与正文有关的参考资料,由于篇幅过大不便编入正文的材料。为以后方便查找史料,我们编写的附录共十七个,附录主要包含几个内容:1、组织机构沿革表(时期、组织概况、下属组织)。2、历年社员人数统计表(年份、人员)。3、历年九三社员基本情况统计表(年份、社员总数、界别分布、职称情况)。4、历年组织情况统计表(市级组织、基层委员会、直属支社、直属小组)。5、历年社员总数及发展新社员数曲线图。6、省委及各市委历届组成人员情况。7、担任历届社中央领导职务一览表。8、九三社员中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享受院士待遇的资深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中国工程建设设计大师、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名单。9、担任政府、司法及有关部门实职名单。10、特约人员,省、市参事、馆员人员名单。11、历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简表。12、现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简表。13、历届专门委员会、社务工作咨询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14、机关专职工作人员名单。15、有关提案和大会发言概览。16、开展讲座情况表。17、大事记。

最后形成完整的编写提纲。

编写提纲在最后确定前要开几会,一会为编委会,二会为主委会或常委会,三会为社内老同志会,四会为社内外专家学者会。广泛征求意见。

总纲出来,就是编写任务。我们制订了关于编辑写作《湖北省九三学社史》方案,在方案中,要考虑总字数、每章节的主要内容和范围、负责撰写人员。编委会要指导每部分写作者,主要写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写。

各部分编写完后,统稿工作也很重要,从量上说,在统稿过程中,要均匀分配字数,做到整体统一,从质上说要注意写法的一致性,要规范用语。

四、在编写过程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历史研究首先需要宏观的视野,瞻前也要顾后。省级九三学社史是以省区九三学社为研究对象的史书,在研究过程中不能仅仅拘泥于一省一社,要把它作为全国九三学社史的一个部分,作为多党合作历史的一个部分。不孤立地研究湖北九三社史,而是将其置于大格局、大视野之下进行探讨。要适当的向前追溯,也要展望其对后事的影响。

2、收集资料要有耐心,要有广种薄收的思想准备,

要带着问题进行资料收集。在茫茫的资料之海中，真正有用的可能并不多。各种相关资料都要看，研究社史不能只看社内的资料，社外的资料、拓展延伸的资料也要看。老领导、老社员都是财富，他们掌握着许多珍贵的材料需要我们及时抢救、整理出来，如，珍藏的文件、会议笔记、杂志、照片、回忆文章等。广大社员的帮助和支持，对社史研究也是十分有价值的。社省委机关平时也要做好自身的资料收集工作，定期整理大事记、文件、会议记录、照片、音频、视频，为将来的社史研究留存资料。

3、综合归纳、取舍得当。各种资料到手以后，要合理利用，取舍得当，既不能粗枝大叶的砍掉了主干、壮

枝，又不能像守财奴一样对收集到的资料什么都不愿意舍弃，以致于臃肿不堪，逻辑混乱。

4、增强自信，设定高标准。很多同志不自信，认为编写历史很难，有畏难情绪，要克服这种心理。研究历史其实并不难，有句话叫“史无定法”，是说历史研究没有可疑的规定要采取哪种办法，有什么研究方法都可以，最重要的是要勤奋、要用心、要付出努力。在编纂社史的过程中，要设定高标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有高标准、严要求，才有可能出精品、上品。

（本文作者为社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

社史编修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殷正初

优秀的社史作品，是加强九三学社优良传统教育的有效载体，能够积极推动我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中央多次编纂、修订社史，各地也积极编纂，出版了不少九三史志。本文试图简略回顾九三学社中央与省级组织的社史编修工作，总结社史编修工作的特点与不足，思考社史编修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以期对各地今后的社史编修工作有所裨益。

社中央的社史编修历程

社中央一贯重视总结、宣讲我社历史。早在1946年底，许德珩就亲手撰写过一份《九三学社》，叙述九三学社从发起到1946年10月重庆分社成立时的历史，明确了发起与成立时间、名称及内涵、组织演变、主要社员、事迹等。1949年6月，为参加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许德珩、薛愚、黄国璋、潘菽、笄移今等五人署名撰写《九三学社概要》，叙述了九三学社从发起到促进北平和平解放、拥护八项和平主张的历史。建国后，许德珩等创始人曾在多个场合宣讲我社历史。

正式编纂社史，则是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才着手进行。第一步是成立社史编修机构。1983年3月，第六届社中央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成立社史工作委员会，许德珩主席为主任委员，副主席周培源、潘菽、茅

以升、严济慈、金善宝等老前辈为副主任委员，社内多位著名专家学者任委员，牟小东任社史办公室主任。社史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社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社史编纂。1985年7月，第七届社中央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建立研究室。此后，社史工作委员会与研究室逐渐合流，一直到今天，社史工作仍主要由研究室来承担。

社史编修机构成立后，很快就有了收获。1984年，编纂出《九三史略（初稿）》；1985年，撰写了《九三学社史稿（上）（讨论稿）》；1991年，印制了《九三学社历史纲要》。1995年，九三学社创建五十周年之际，刊发了《九三学社简史》（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采取正文与大事记合本的形式，全书164页，其中正文85页，大事记78页，编后记1页，章节简洁，用语平实，叙述了九三学社从创始至1992年社六大的历史。1998年，对上述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正式出版了《九三学社简史》。此后，分别在九三学社创建六十周年、七十周年之际，增订出版了《九三学社简史（2005年修订版）》、《九三学社简史（2015年修订版）》。

综上可知，社中央的社史编修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领导重视，许德珩主席亲任社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许老在世时，多次敦促早日出版正式的社史作品。二是

耗时较长,从1983年成立社史编修机构到1998年基本定型出版《九三学社简史》,前后花了15年时间;社史作品的名称也几经更迭,采用过“史略”“史稿”“历史纲要”等称谓,最后才确定为“简史”。三是参与广泛,除了社中央机关社史办公室的专门人员外,还邀请过省级组织、高校的专业人员参与编写,著名的历史学家祁龙威在主持社中央机关日常工作的孙承佩同志的邀请下,也曾深度参与过社史的编纂工作。四是多次修订,目前共增补、修订过两次,分别出版了《九三学社简史(2005年修订版)》、《九三学社简史(2015年修订版)》。

各地社史编修谱系(以省级组织为主)

据初步统计,目前共有12个省级组织出版了九三学社史志,海南、湖南的九三社史即将出版。具体如下表:

九三学社省级组织史志名录

时间	书名	出版机构
1993年	九三学社山西省委简史	九三学社山西省委《简史》编委会编
1995年	湖北省九三学社史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1年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五十年(1951-2001)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委员会
2002年	重庆九三学社	重庆出版社
2002年	河南九三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	湖北省九三学社史(新版增补本)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	九三学社陕西简史(1951—2005)	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员会
2010年	江西九三学社史	学苑出版社
2010年	云南省九三学社简史(1956年-2008年)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年	安徽九三学社简史	九三学社安徽省委员会
2012年	九三学社浙江简史	九三学社浙江省委员会

2014年	辽宁九三学社简史	学苑出版社
2014年	九三学社河北省志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此外,沈阳、长春、南昌、泉州、烟台、枣庄、嘉兴、开封等十多个副省级市及地级市出版了九三史志,部分县市级组织也出版了九三史志。

与社中央《九三学社简史》“正文+大事记”的体例比较,地方社史最大的特点是:体例灵活,资料全面。能够在一本书里容纳更多的内容,呈现更多的维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当地九三学社百科全书的作用。譬如,在地方社史编写谱系中,1995年出版的《湖北省九三学社史》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并于2005年增补新版,它的体例是这样的:正文十章,全面描述了湖北省九三学社组织发展的历史轨迹、地方组织、社史人物;正文后列有17个附录,内容覆盖组织机构沿革、历年社员人数统计、社员基本情况、组织情况、知名专家、机关专职工作人员、提案、大事记等领域。全书详略得当,有主有辅,各部分相得益彰。此后,江西、云南等大多数省级组织编纂的社史,在体例上大致继承了《湖北省九三学社史》,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略有调整。¹

省级组织编纂、出版九三史志,实属难能可贵。但由于受到资料、时间、专业等方面的限制,也不可避免存在诸多有待改进之处。大处着眼,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社史叙述存在工作报告化的倾向。通常情形是,早期社史叙述,根据有限的史料,按照时间先后叙述历史事件,可读性较强。越接近当下,篇幅越多,内容却越来越类似工作报告的翻版,缺乏适当的剪裁、取舍。这一问题,社中央与各地方组织编修的社史,或多或少都存在。第二,部分作品有待由“志”进化为“史”。例如,《重庆九三学社》《河南九三志》《九三学社河北省志》,都属于“志”,尚非社史。志以类聚,更接近资料汇编,显得组织分散,脉络不清,不便于全面了解当地九三学社的发展历程。但是,社志为社史编纂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有条件还是应该更进一步,形成真正的社史作品。第三,有待增补、修订。目前,各地已经出版的社史,只有《湖北省九三学社史》出过增补

1. 地方社史,大多借鉴《湖北省九三学社史》的体例,只有《辽宁九三学社简史》是个例外。《辽宁九三学社简史》以社中央《九三学社简史》为模板,采用“正文+大事记”的体例,简洁、清晰,对各个时期,特别是省委会筹建前九三组织在辽宁发展的来龙去脉叙述得很清晰,也是一部优秀的地方社史作品。

修订版——在陈峰教授的主持下，《湖北省九三学社史》于1995年出版，2005年增补新版。自然，这主要针对较早出版社史的省级组织而言，毕竟更多的省级组织尚未编纂、出版社史。

社史编修的几点思考

我国是一个史学传统悠久的国家，前人在历史编纂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总结出了宝贵的经验。通常认为，由刘知几、章学诚提炼出的“史家四长”，是一个历史从业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这“四长”也同样适用于社史工作者。

“史家四长”，是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参照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柳诒徵《国史要义》的理解，史德主要指客观中等的态度，史学指研究领域，史识指观风察变的见识，史才则是指编纂历史的具体才能，能用简洁、精确的语言组织史料，清晰、生动地叙述历史事件。具体到社史编修中，我们都是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编纂社史，以期准确、全面叙述我社的渊源流变，达到传承历史、凝心聚力的效用。德、学、识三长，在社史编修中是基本确定的，需要不断磨炼的是“史才”，也就是社史编修的技术与方法。

个人认为，提高社史编修的“史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组织重视 专家负责。换句话说，组织要找准具备史才的责任人。优秀的社史作品，无一不是因为组织高度重视，找到了合适的责任人。譬如，《湖北省九三学社史》的主编陈锋教授，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具有深厚的史学基础与编著经验，在社史的编纂与修订中统筹全书框架结构，发挥了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海南省九三学社为编纂社史，邀请社史专家、《九三史话》的作者王世铎同志长期顾问。《江西九三学社史》执行副主编肖礼庆同志、《辽宁九三学社简史》的主编唱贺奇同志，都既深具文字功力，又对当地九三学社的发展历程有着切身的体验与深入的了解。

二是尽可能广泛收集社史资料。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史科学，扎实的史料是编修社史的基础。社史史料，包括档案、文件汇编、口述史、年鉴、民主党派志等等。现有各地九三学社史志中，《江西九三学社史》花了大功夫收集资料，制作了大量的表格，扎实呈现了江西九三的发展历程。而《九三学社河北省志》达80多万字，资料丰富程度为所有九三史志之首，做到了“横排

门类、纵述史实”、“大事突出，要事不漏”，覆盖了河北九三发展的时代背景、历史沿革、参政议政、社会服务、人物、大事记等领域。而即将出版的《九三学社湖南简史》，则利用了新发现的《九三学社》手稿等社史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社中央档案已经全面完成数字化，查询较为方便，各地方组织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档案资源。此外，社史资料室历年收集了不少社史资料，如九三学社早期各地花名册、《九三学社概要》、创始人往来信件等；《社史研究通讯》“社史资料选登”栏目刊发了不少新发现的社史资料。

三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研究成果。具体说来，就是要认真借鉴最新修订出版的《九三学社简史》（2015年修订版）。各地编修社史，通常会在绪论部分论及九三学社整体层面的简要历史。经过2015年集体修订，现存所有叙述九三学社历史的作品，以《九三学社简史》（2015年修订版）最为准确、权威。各地社史，作为地方九三学社的官方史书，理应以社中央最新官方史书的记载作为标准。此外，还可以适当关注九三学社人物丛书与口述史项目中的新发现、新成果，以及《社史研究通讯》上刊发的研究论文。

四是借鉴先进，选择适当的社史体例。现有地方社史，主要存在两种体例，分别是以《湖北省九三学社史》为代表的“正文+许多附录”的形式，《辽宁九三学社简史》为代表的“正文+大事记”的形式。各有可取处，目前多数地方组织以《湖北省九三学社史》的体例为模范，根据当地特点，适当变通。如果编纂社史的时机还不成熟，也可以先行整理出版《九三学社志》，为今后编纂社史打下基础。在社志中，《九三学社河北省志》值得借鉴。

五是修改，修改，再修改。前人说校书如扫落叶，随校随生。社史编纂中的修改也是如此。修改的次数再多，下次阅读时仍会发现不够完善之处。我们了解到，《湖北省九三学社史》《海南省九三学社简史》《九三学社湖南简史》，无一不是经过许多次修改。而以社中央《九三学社简史》（2015年修订版）为例，我们在邵鸿常务副主席、郭悦主任的率领下，前后进行过十几次的修改，逐句逐段核校，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继续研究，今天读来，还是会发现一些细节上的错讹与欠缺。

（本文作者为社中央研究室社史研究处主任科员）

九三学社历次代表大会简辑

侯艳华 整理

(一) 1946年九三学社成立大会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在重庆青年大厦召开,选举潘菽、张雪岩、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吴藻溪、黄国璋、彭飭三、王卓然、孟宪章、张西曼、涂长望、李士豪、笄移今、张迦陵、严希纯16人为理事,卢于道、詹熊来、刘及辰、何鲁、侯外庐、黎锦熙、梁希、陈剑鞘8人为监事。通过《成立宣言》《基本主张》《对时局的主张》,反对内战、独裁,争取民主、和平。

(二) 1950年九三学社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

1950年3月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后,九三学社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恢复中央理事会。许德珩任主席,梁希任副主席,黄国璋任秘书长。许德珩、孟宪章、黄国璋、梁希、薛愚5人为常务理事,黎锦熙、谢立惠、裴文中、严济慈、孙承佩、薛愚、方亮、孙荪荃、吴藻溪、笄移今等15人为理事。新的中央理事会在整理内部、健全机构和发展社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12月1日-5日,九三学社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63人。大会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会,除原有理事外,增选卢于道、洪铭声、税西恒、高觉敷、金善宝、彭飭三、袁翰青、涂长望、叶丁易、劳君展、鲁宝重、董渭川、初大告等13人为理事,顾执中、洪涛、王克诚、漆文定、金涛、汤噪真、张效良等7人为候补理事。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确定本社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的中心工作,巩固与发展本社组织,明确了以政协会议《共同纲领》为社的纲领,决定创设《九三社讯》为机关刊物。在中共帮助下,九三学社有了史上第一个固定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四颁赏胡同。

(三) 1952年九三学社第二届全国(扩大)工作会议

1952年9月11日-20日,九三学社第二届全国(扩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93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决定将社的中央领导机构名称由原来的理事会改为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由47人组成的九三学社第三届中央委员会。许德珩当选主席,梁希当选副主席,方亮等19人当选常务委员。涂长望任秘书长。

大会修订了社章,将九三学社性质表述为“以小资产阶级文教科学工作者为主要成分的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政党,是中国人民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四) 1956年九三学社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

1956年2月9日-16日,九三学社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44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许德珩任主席,梁希任副主席,周培源等22人任常务委员,干铎等78人任委员。涂长望任秘书长。任命许德珩兼组织部部长,孙承佩任宣传部部长。

大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刚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号召社员向科学大进军。

(五) 1958年九三学社第二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

1958年11月28日-12月15日,九三学社第二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226位代表出席。大会选举产生了由91人组成的九三学社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许德珩当选主席,周培源、潘菽、茅以升、涂长望、严济慈当选副主席,干铎等26人当选常务委员。孙承佩任秘书长。

大会通过《九三学社章程总纲》和《九三学社改造规划》,将九三学社的性质表述为“一个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民主党派”。决定社刊《九三社讯》改名为《红专》。

(六) 1979年九三学社第三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

1979年10月11日-20日,时隔21年后,九三学社第三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98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20人组成的九三学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许德珩当选主席,周培源、潘菽、茅以升、严济慈、税西恒、金善宝、卢于道、王竹溪、柯召、孙承佩当选副主席,方亮等29人当选常务委员。孙承佩任秘书长(兼)。

大会对社章进行了重大修改,将九三学社的性质表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以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

者的政治联盟，是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会议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召开的，号召全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这是九三学社恢复活动以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奠定了九三学社以后发展的基本框架，在九三学社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七）1983年九三学社第四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

1983年12月2日-14日，九三学社第四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300名代表出席。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69人组成的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许德珩连任主席，周培源、潘菽、茅以升、严济慈、金善宝、卢于道、柯召、孙承佩、徐采栋、郝诒纯（女）、安振东当选副主席，王应睐等62人当选常务委员。赵伟之任秘书长。

大会修改了社章，将九三学社的性质表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民主党派，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八）1988年九三学社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8年12月31日-1989年1月8日，九三学社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485位代表出席。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01人组成的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周培源再次当选主席（注：在九三学社七届三中全会上，会议接受许德珩辞去主席职务的请求，一致推举周培源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孙承佩、徐采栋、郝诒纯、安振东、王文元、杨樵、吴阶平、陈明绍、陈学俊当选副主席，刁培德等52人当选常务委员。李毅任秘书长。

大会修改了社章，将九三学社的性质表述为“由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

（九）1992年九三学社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2年12月26日-30日，九三学社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535位代表出席。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90人组成的九三学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吴阶平当选主席，徐采栋、郝诒纯、安振东、王文元、杨樵、陈明绍、陈学俊、赵伟之、洪绂曾、金开诚当选副主席，马赫等81人为常务委员。刘荣汉任秘书长。

大会修改了社章，将九三学社性质表述为“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

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

（十）1997年九三学社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7年11月8日-13日，九三学社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586位代表出席。选举产生了由225人组成的九三学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吴阶平当选主席，安振东、王文元、赵伟之、洪绂曾、金开诚、王选、黄其兴、刘应明、闵乃本、谢丽娟当选副主席，王幼辉等45人当选常务委员。刘荣汉任秘书长。

（十一）2002年九三学社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2年12月3日-8日，九三学社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624位代表出席。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25人组成的九三学社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韩启德当选主席，洪绂曾、金开诚、王选、刘应明、闵乃本、谢丽娟、陈抗甫、冯培恩当选副主席。徐国权任秘书长。

（十二）2007年九三学社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7年12月8日-13日，九三学社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680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25人组成的九三学社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韩启德再次当选主席，王志珍、陈抗甫、冯培恩、贺铿、邵鸿、谢小军、张桃林、赖明、马大龙当选副主席。徐国权任秘书长。

（十三）2012年九三学社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2年11月30日-12月4日，九三学社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666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40人组成的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韩启德连任主席，邵鸿、谢小军、张桃林、赖明、马大龙、丛斌、赵雯、卢柯、武维华、印红当选副主席。邵鸿当选监督委员会主任，丛斌、刘政奎当选监督委员会副主任。印红任秘书长（兼）。

（十四）2017年九三学社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2年12月3日-7日，九三学社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658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36人组成的九三学社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武维华当选主席，邵鸿、张桃林、赖明、丛斌、赵雯、卢柯、印红、黄润秋、潘建伟、刘忠范当选副主席。邵鸿任监督委员会主任，丛斌、刘政奎任监督委员会副主任。印红任秘书长（兼）。

（本文作者为社中央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处长）

编者按：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潘菽日记载于《潘菽全集》第九卷。日记现存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1949年9月7日至9月23日，此时潘菽在南京受命参与接管中央大学，日记主要记述潘菽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奉命赴苏联参加巴甫洛夫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旅途见闻；第二个时段是1957年1月1日至5月20日，此时潘菽已调至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日记主要记述在心理所与九三学社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日记多处谈到与其他九三创始人许德珩、梁希、黄国璋、袁翰青、涂长望等人的交往。此处选录日记中与九三学社关联度较高的部分。

交心材料现存于社中央档案室。共计123条，作于1958年4月。其中，4月15日提交第1-12条，16日提交第13-33条，17日提交34-63条，22日提交64-78条，24日提交第79-102条，29日提交第103-123条。交心材料与日记相互印证，除了阐述心理学、社会氛围外，还较为清晰地呈现了我社在建国初期的重要史事，以及潘老的性情与人格。

潘菽日记与交心

(一) 日记选录

1949年9月7日 星期三

本日动身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夜间12时40分在下关车站上车，同行者有梁叔老、陶孟和先生、涂长望、侯德榜、姚克方、陈鹤琴等共11人。

同日下午接到了丁瓚电报说：周副主席嘱即去平转苏参加巴甫洛夫百周祭，但我毫无准备，只得到了北平再说。

9月8日 星期四

是日在车上，夜间过济南。

9月9日 星期五

12时左右到天津，下午2时20分到北平，住北京饭店436号。到北京饭店后即晤丁瓚，和他谈赴苏问题，当时即决定赴苏，请他代为接洽。

晚上赴海平处，即留宿。

9月10日 星期六

晨在海平处与叶丁易一谈，即到府学胡同北大教授宿舍访许楚生和袁翰青，都不在家，看到他们的太太。

返北京饭店向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报到处报到，取得纪念章一枚为243号。

下午4时许晤许楚生兄，海平、翰青、长望亦先后

来，共同商量因赴苏不能出席新政协会议所引起的问题。

晚赴海平处吃蟹二只。北平蟹比江南蟹美观。但此时当未长足，壳薄而少脂黄。

11时许到六国饭店看大哥，门岗坚不允入内。

9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10时赴箭厂胡同2号张雪岩兄处参加九三学社同人会议。公推薛愚兄补我不能出席新政协所留的缺。

午饭后晤谭惕吾。访大哥，谈一个多小时。我提到许多熟人因这次的解放都失了业，他认为很少有办法。他问到我的“人理学”写出来了没有。我说还很要研究。他面色颇好，但显得清瘦。

3时许在欧美同学会参加出席新政协的科代筹委座谈会。初次见面的有恽子强、李宗恩、贺诚、蔡邦华、吴玉老。

1957年1月22日 晴

晚上，九三的几个同志来宿舍开会，商谈社二中全会的内容。

2月22日 晴，开始有春意

所支部同志关照我，我的预备党员期快满了，要准备做转正的申请。和他谈了申请书应有的内容。自己感觉一年来的进步太少了。

复阅捷普洛夫论文的摘要译文，多看出了一些头脑。

晚上参加九三的一个座谈会，讨论科学研究机构扩大团结，开展工作的问題。

2月23日 雪

整天复阅捷普洛夫论文的摘要译文，大部分都能体会，但还没有做到“罗列清楚”，类型问题确乎是十分复杂的。我认为“神经类型”和“性格类型”应该分开来研究，前者归生理学者，后者归心理学者。在心理学上研究到人时，什么是“遗传的”，什么是“获得的”，恐怕不可能分得清楚。要采用辩证统一的观点，不宜采取形而上学的看法。心理学的主要问题应该是研究人的性格类型的发展规律，决不宜和生理学在一起去追求“神经类型”。

晚上看电影《刘巧儿》。新风霞演得很好。把歌剧搬上银幕并不显得不自然。比《梁山伯与祝英台》更真实，因为更接近于现实生活。

2月24日 雪，午后停

在宿舍内阅读《巴甫洛夫选集》中论高级神经活动一般类型的论文和捷普洛夫的《论神经系统的弱性和惰性两概念》。读巴氏的论文觉得有些混乱。

中午九三招待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和获得科学奖金的社员，去作陪。

3月15日 晴

晚上去前门饭店参加社的招待会，招待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九三同志。卢于道同志的发言对我颇有启发。他主要的意思是说，不能只管自己要进步，也要带动别人一起进步，关心别人的进步要求。这话正击中了我的一个主要的弱点。我的这个弱点曾表现在我对社的发展问题的看法上。

3月18日 晴

读心理学英文文献一篇，写了卡片。

晚上参加社的中央常委和二中全会筹备委员会的联席会议。

3月22日 阴，晚下薄雪一层

出席九三第四届二中全会。

3月23日 阴

出席九三二中全会，上午下午都是小组讨论。

晚上看谭富英和裘盛戎演的《清官谱》。

3月24日 晴，星期日

参加社组织的集体去碧云寺、静宜园、卧佛寺、颐和园等处游览。下午4时归。静宜园规模宏大，佳处不少。颐和园后山小溪虽人造而富于自然之美。同游者有宣移今、涂登榜、柯如、朱物华、梁东园、陈时伟等。

3月25日 晴

出席九三会议，上午下午均小组讨论。晚上决议案起草委员会少数同志交换关于社当前工作的决议草稿的意见。

3月26日 晴

出席九三会议。上午下午均小组讨论。晚上参加汇报会。

3月27日 晴

出席九三会议。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召集决议案起草委员会会议。晚上大家发言，后参加社当前工作的决议草案的修改小组的工作，至1时余始毕。留宿北京饭店。

3月28日 晴

上午召集决议案起草委员会讨论关于当前社的工作的决议草案的定稿问题。下午九三二中全会闭幕。

3月29日 晴

高觉敷来所略谈，关心到所内外的团结问题。晚上和谢立惠、柯召、周培源、陈时伟等在许楚生家谈高等学校内的党群关系问题。谢和周谈得较好。我所谈的可以说很空洞。

4月8日 阴，午后开始飘雪，晚雨

晚上出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会议上修

正了《关于当前工作的决议》。

4月9日 整天下雪，地上积约二寸
阅《中国思想通史》，不得头绪。

4月10日 晴
晚上写入党转正申请书，未完。去年3月8日参加党以后，预备期已超过一个月了。

4月11日 晴
早晨上办公室前，续写入党转正申请书仍未完。
所务会议上通过了五个研究生的学习方向。
晚上参加党支部会议，讨论所内统战工作问题。

4月12日 晴
早晨上办公室前，续写入党转正申请书完。
和彭瑞祥及王景和谈研究计划的问题。
午后参加所内九三小组会，向小组传达社二中全会的经过和决议。

4月27日 晴
晚上参加九三举行的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好几位同志的发言都是慷慨陈词，反映了不少应该注意的情况。

5月4日 晴
午后去北海参加所内青年团的集会，谈了“五四”的回忆和两点感想。第一点感想是关于五四运动中担任领导工作的青年有一部分在不久以后就变成落后甚至反动这个事实的。第二点的感想是关于五四时代的青年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有没有完成的问题的。

晚上去广和剧场看潮州黎园戏。唱做都颇细致。

5月5日 晴，星期日
科学院九三支社在卧佛寺举行全体大会并改选支委会。8时共同乘车前往。会后游樱桃沟。山谷幽深，泉水潺潺，树木繁密，颇出意外。4时半乘车回城。

和曹仞千去“烤肉宛”吃烤肉。口味嘉美亦出意外。

5月6日 晴

修改《心理学中的意识问题》的研究计划并参考文献目录。

5月7日 晴，午后刮风

复阅波林《关于意识》一书的第一章。他认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都是从经验推断出来的东西。因此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一元论。仍是一种旧戏法的新花样。

5月8日 晴

下午开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学习，但只漫谈了人民内部矛盾是否都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表现。这种谈法有钻牛角尖的倾向。

5月9日 阴，晚雨

原科学院规划委员会心理学小组的同志举行集会，由戴伯韬同志传达科学规划十人小组对于社会科学部分教育学中的教育心理学几个中心问题的提法的修改意见，经讨论大家表示同意。

5月10日 晴

晚上参加九三召开的“教授治校”问题座谈会。发了言，主要意见为，教授治校对于改正当前高等学校中工作上的主要缺点，发挥教授们的积极性，克服学校领导和两个教育部的领导的官僚主义会有很大好处。其他同志的发言都有很好的内容，都可以相互补充。这种情况最足以说明讨论的必要，也就是集思广益的必要。

5月11日 晴

晚上出席九三科学院支委会。

(二) 交心 123 则

1. 土改之前，一个堂兄弟（潘洪年）（地主）在家乡耽不住了。到南京住在我家里，我也就允许他留下来。我觉得家乡农民对待他可能有些过火，因此我还设法介绍他进华东革大南京分校学习。这事实上是对地主堂兄弟的包庇行为，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但我那时并没有这样的认识，没有能划清敌我界线。

2. 另一个堂兄弟潘载年（洪年的亲兄弟）原是一个农民，在土改之前在家乡被枪毙了。我不明了他的罪状（至今仍不明了，只相信一定是有罪行的），也觉得他受到这样严厉的处分，恐怕有些做得过火。他也曾到南京住在我家里几天，但不久就回去了。

3. 几年来对所接触到的党员同志都相处得很好，没有感情上的抵触，但在南大时对两个青年党员干部颇有反感，因此我觉得他们对我太无礼貌。

4. 在南大时，对副校长孙叔平同志虽然在工作关系上基本上好的，但也有些意见，因为他有些专断。我有时感觉到，他是在支配我。因此合作关系并不是完全合乎理想的。这里也包括我自己在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以及工作积极性上的一些缺点。

5. 在抗美援朝问题最初提出来的时候有些怀疑，恐怕新成立的人民中国还不是帝国主义的敌手。虽然对于毛主席“美国是纸老虎”的说法并没有怀疑，但事实说明我那里仍有恐美思想。

6. 1949年4月我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有一天齐燕铭同志约我在晚上谈话，那天晚上有电影晚会，大家去参加晚会去了。我一个人留在房间里等候。但等了一个晚上，齐同志始终没有来。后来，他也没有向我说明。我感觉到很不高兴，我对他的不良印象保持很久。

7. 在南京时，曾有一个时候对初任职的统战部长王昭铨同志在民主党派会议上讲话时往往觉得他有些咄咄逼人。后来我的这个感觉逐渐没有了，觉得他改进很多。

8. 对大学毕业生分配政策（或办法）曾有意见，觉得那种做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效果也不好。我那里认为分配工作应让教师和系的负责同志参加意见，不宜由人事部门单独决定。

9. 曾对农业增产怀疑。因为中国人口多，每人的土地不足，每年的增产不多而人口增加相当快。因此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不是很高的。最近由于兴修水利的高潮，和肥料问题有解决可能，我的这个问题已没有了。

10. 社的第二次工作会议时，曾反对把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政党这种讲法。到了胡风问题出来后，我才看清楚民主党派的成员都还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前提的，我才开始了解民主党派的确还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党。

11. 对于过去思想改造的成绩估计过高。因此，虽然曾一度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但到后来有偏重业务的倾向了。

12. 在镇反肃反时，我思想上没有波动，但在三反五反时曾看到有些人（主要是熟识的人）在被斗争时的情况而产生了温情主义。

13. 在南京时对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认识仍不够，因此对南京分社的领导工作虽然没有出大毛病，但在积极方面是做得很不够的。

14.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我曾认为苏联驻军应该退，只看到事件发生的内部因素，没有了解到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动这个主要方向。

15. 解放以后，对社有取消思想，我的取消思想的来源是“太平思想”，对解放以后还要进行长期的艰巨工作认识很不够，因此对社所联系的分子还要进行自我革命和所应负担的任务，这一点也认识很不够。

16. 在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的初期，所到从许多方面来的农民留粮不足不能吃饱的传说，曾不加辨察就信以为真，认为政策的执行发生了偏差。这说明我对这个重要政策仍然理解不够而对地主富农等则放松了警惕性。

17. 在批判胡适时期，我采取了旁观态度。虽然认为胡适应该批判，但假如要我写一篇文章就觉得很少话可说（在学术方面）。

18. 讨论社是否为小资产阶级政党时（在中央统战部），徐冰同志要我讲几句话，我却没有讲。因为我那时对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个说法不心服。要说我的意见，恐怕影响不好。要违反自己的意见说话也觉得有困难。

19. 在院系调整时，对旧南京大学法学院许多位（不是全体）教授的安排我觉得不适当，因此颇有意见。因为照调整方案，南大法学院是和华东政法学院合并在一起的，但教授却一个也不接收过去。

20. 在解放初期，仍把社继续看做是一个“政治性的学术团体”而不以为它是一个政党。这也说明我对民主党派应有的性质和任务认识很差，同时说明我的政治思想很薄弱。

21. 我的一个女儿在初中毕业后就被调到党中央机关要局工厂工作，我觉得对她使用得多而培养则不够。

22.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体会不正确。在初听到陆定一同志作关于这个政策的报告时，心中颇

怀疑,觉得什么话都容许讲会造成思想混乱,有害于马列主义的宣传。听了好几位领导同志关于这个政策的报告后,我的理解又偏到另一方面去了,偏向于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体会这个政策。

23. 去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出来后,我感觉到惊讶,觉得太早一些,认为是收了,和鸣放政策不符。这主要是由于我对鸣放政策的理解原来是不正确的。

24. 去年鸣放期间,对许多右派分子的文章并没有感觉到异样,并没有看出其中有多大问题。事实上对有些右派文章(如“早春天气”)还相当欣赏。这是由于自己的政治水平低和对鸣放政策了解不正确。

25. 反右斗争开始时,我已出国。在国外听到反右斗争时,颇为震动。因为①有些右派分子完全出自己的意料(如高觉敷),②自己在鸣放期间也有一些错误言论,感到自己在政治上的毛病也不小。

26. 在社中央的座谈会上,我对“教授治校”的说法表示了同意,认为在学校内扩大一些民主是需要的,我所以有这样错误的言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事先曾听到毛主席有考虑在高等学校不设党委的意思这一说法。这一说法后来看起来当然是一种谣传。但我竟轻信不疑,这说明我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

27. 对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很有反感,但在初听到时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个谬论的恶毒性所达到的程度。

28. 在参加科学规划工作时,对设立九三小组的工作颇积极,认为可推动参加规划的九三同志把规划工作做好。那时规划委员会的党组对这件事并不热心支持,我曾不以为然。在这里多少有些使社的工作和党组的工作分庭抗礼的想法。

29. 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出来后,我也有把社看作是一种“在野党”的倾向。

30. 在快要调来北京之前,曾有一次在南京大学支社会上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当时讲的话已记不清楚,但记得我的谈话的重要内容是强调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的需要,并强调说明党提出这个口号是完全有诚意的,至于民主党派应该在怎样的条件下来共存和监督则几乎没有谈到。这也说明我有把社看作一种“在野党”的倾向。

31. 对于民主党派代表成员的合法利益这一点我的

认识也有不正确的地方。我曾认为社对社员在工作和生活上一一些个人要求也可以说说话。

32. 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改造任务的重要性在思想意识中有逐渐减轻比重的趋势。这也是由于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的体会不正确的缘故。

33. 在南京时,对党所布置的民主党派工作曾有一个时候有厌烦的思想,认为太多了,觉得有些吃不消。

34. 反右斗争发动后,我缩短在国外的访问时间回来参加斗争运动。但我回到北京后仍观望了两三天,没有马上投入运动。这说明我当时的反右情绪并不高。

35. 在反右斗争之前,对右派分子,除储安平等少数人外,并没有觉得怎样可恶。并且我对许多右派分子在鸣放期间的言论还感到相当同情,认为他们把心里话敢于讲出来总是好的,是符合于鸣放政策的,并认为他们的话也有可取之处,揭露了一些应该解决的矛盾。

36. 在反右之前,我基本上是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右派言论的。我并没有深入分析这种言论的本质。我并没有仔细辨别哪些是香草、毒草。这说明我在思想中缺乏辨别香草和毒草的标准。也就是说,我的立场是模糊的。

37. 在反右斗争中有相当浓厚的温情主义。我在反右斗争中的温情主义主要是对平时很熟识的几个右派分子而产生的。因为①一时撕不下面子,②对他们的优点平时注意得多,对他们的缺点或阴间面则注意或了解得比较少,③立场还不鲜明,大是大非没有辨别得清楚。

38. 关于文字改革,我同意汉字必须改革,并且必须走表音的道路,必须改革得便于学习,便于打字和印刷。但我对采用拉丁字母的方案有怀疑。我认为汉字改革应该走汉字自己的发展方向。这就是说,不应该割断历史。

39. 关于汉字简化,我完全同意。我认为应该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地来做。现在文改会也就是这样做的。我不同意个人随便简化汉字,以后损害了汉字的文学效用。

40. 我觉得竭力主张汉字“拉丁化”的人的思想是长期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对自己丧失了信心的残余。我这样看法可能是很错误的。但这是我的真实思想情况。

41. 对于原高教部取消南京大学的心理专业很有意见。我并不是要坚持保留这个专业。我的意见主要是由

于高教部对这个专业的处理意图并没有怎样和我作为当时的校长和心理专业的一个直接负责人好好谈过。我认为原高教部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不但手续上很不对,并且缺乏远见,也没有真正尽到领导的责任。

42. 南京大学副校长孙叔平同志(原是南大党委书记,那时是否还是书记我不知道)对于南大心理专业的存废采取无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我感到很遗憾。

43. 对于现在的选举制度,原来也有怀疑。后来经过讨论研究,怀疑没有了。因为候选人名单是经过和各方面反复协商然后决定下来的。这里已充分发挥了真正的民主。至于投票不过是完成民主的最后一步手续。所以不能单从投票来看。当然这个好的制度也会贯彻得不好,那就要看协商得是否充分。

44. 从间接听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有些街道积极分子或其他的积极分子有单纯从完成任务的观点出发以致在工作上有强迫命令,简单对待这一类的偏差。这种偏差有时候会影响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对这些在工作上有毛病的积极分子当然不能泼冷水,但要好好领导并教育。

45. 现在的人事制度,我觉得有些地方太呆板,丧失了应有的灵活性。我主观上认为人事制度也需要能做到“人尽其材”。照现在的人事制度,假如一个人被安排得不适当,就很不容易调整,尤其对于有才能而安排得不很适当的人是如此。

46. 我原来对于学校中的党委制并无怀疑,但竟于去年5月间社中央的座谈会上同意了“教授治校”的讲法。我的主要想法是把学校中的民主更扩大一些。但照我所同意的讲法做去,必然要削弱党的领导,使学校行政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两条道路的问题在高等学校也是完全适用的。但我当时对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是很模糊的。

47. 关于除四害,为什么对于麻雀要花这样大的气力来搞我有些不明白。

48. 对于高等学校中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我一向认为在原则上应该并重,但在具体措施上可以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轻重。因此,我认为过去高教部在原则上偏重高等学校的教学任务是不适当的。当然我对于解放以后的几年用全力来搞教学改革是认为正确的。对于过去的教育部把科学研究列在很小的地位,我更不以为然。

49. 我对于学习苏联全心拥护。我在自己的业务,心理学方面仍积极主张学习苏联。但我觉得有些人在学习苏联问题上陷于教条主义,还有一些人因为学习苏联而把自己的“专家”完全摆在一旁。我觉得这是缺点。

50. 在反右斗争时,对有些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相当浓厚。直到把他们的材料作了详细研究以后,才看清楚了他们的右派面目,克服了自己的温情主义。但对个别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仍然没有能完全克服。

51. 处理右派分子的政策,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是合情合理的。但在政策的具体应用上,我觉得有个别地方还不是最妥帖的。我指的是对陈时伟的处理。把他开除公职,我感觉到严厉了一些。我虽然也举手通过对他的处分,但仍然留下这感觉。我明知这种感觉可能是错误的,但既然是我的一种思想情况,也要交出来。

52. 我对于黄国璋所受到的处分一直有些不明白。我对于他虽然比较熟悉,但可能对于他当时的阴暗面仍然没有完全了解。

53. 对于干部下放政策,我最初有些怀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丢包袱或单纯的精简办法。现在看来,这个政策是很正确的。干部的劳动锻炼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内经常保持国家干部的健康性,避免由于脱离生产劳动而趋向于堕落腐化。

54. 关于劳动锻炼,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很需要的。由于年龄和健康情况,我大概不适宜去做重体力劳动了(如十三陵修水库的劳动)。至于较轻的劳动,我还是可以做的。但有一次大家去摘棉花,我却没有报名去参加。这说明我还是轻视劳动锻炼的。

55. 自己回顾一下,我几年来在工作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或者说革命干劲是很不够的。许多事情都是奉命而行,大半采取一种被动的例行公事的态度。对于自己的要求偏向于只要能交代的过去,不犯错误就算。主动想办法把事情做得尽可能好的努力是不够的。我觉得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表现。我从这里也清楚看到自己的立场还有问题。

56. 对人事制度的另一个曾经有过的意见:不少被分配做高等学校助教和科学院研究实习员的青年并不适宜于他们的工作,缺乏培养前途。我认为人事部门有做衣服可以不管料子的思想偏差,以致造成培养青年科学干部上的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困难。

57. 我对于斯大林同志不是完全心服的。我觉得他有些“霸气”，尤其在学术问题上。我觉得他受到批评是应该的。我曾参加巴甫洛夫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当时对于许多学术报告最后也要歌颂斯大林一番，感到很不习惯。

58. 我对于布尔加宁的没有被提名作候选人(?)和没有被分配作其他的重要工作(?)有些讶异。我觉得明白交代一下比较好。

59. 三年前，我去高教部拜会了黄松龄副部长，他和我说到心理学的问题，因为没有谈完，分别时说明以后再谈。过几天我写信给他请他指定一个时间再谈。他却派一个人来问我要谈什么问题。我当时很有反感，回答说：假如黄部长觉得没有什么要谈就不必谈了。我觉得他的架子太大，不愿意和下层的一个干部交换一下意见。我当时的态度可能也不对，但还没有能给自己分析批判。

60. 在物资供应方面，听说有些地方的农民每月只能分配到二、三两食油，觉得太少了。但我了解这是一个生产有限的问题，而不是分配上的问题。同时，我感觉到自己的食油除了定量分配以外还有一斤多的额外照顾是过分了。

61. 过去几年许多中小學生不能升学，我觉得这将是一个长期难于解决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困难问题。最近有了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或者学习和生产相接合的办法，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个办法的主要精神在于打破常规思想，大胆创造。这对于我的启发和教育很大。因为我的常规思想是严重的。学习和生产相结合的办法在教育史上将写成新的一页，是完全符合于社会主义的。

62. 我现在没有明显的名位思想。那可能是因为我可能得到的名位都已经得到了或者超过了。假如得不到现在的名位，我会有意见呢？那还难说。因此，我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清除了名位思想。

63. 自己在工作上的个人单干倾向颇厉害。虽然口头上也常常讲集体主义的重要，但行动上往往忘记了集体，忘记了群众。这是个人主义没有清除，无产阶级立场没有确立的一种表现。

64. 三反时，我的兄弟潘企之被隔离反省一两个月。我对他了解比较多，认为他决不会贪污，因此我觉得他

受到这种处理是冤枉的，运动是会发生偏差的。但我对运动本身并没有发生怀疑。

65. 在解放初期，我以自己私人关系作用陈蓉荪到南京分社工作并任用胡镕成到南大做秘书工作。这两个人在政治上都是不好的。这说明我仍以旧的作风，旧的观点对待人民的革命事业。也就是说，我的责任心太不够，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

66. 南京市政府总认为南京大学的校地太大了，可以划去一部分。我则认为从远处看，南大的校地还小了一些而不是太大。因此我对南京市政府对南大校地的处理很有意见，认为有些干部对一个大学的需要太少了解，也缺乏远见，以致会造成不可补救的错误。

67. 在南京时对解放军中个别的领导同志感到不满，觉得他很神气，眼睛里看不到别人。这说明我在一定条件之下和解放军同志还是会有距离的。我对那个同志的不满也可能是由于我自己的误会或者缺点。

68. 有一位解放军领导同志的住宅在南京大学校地范围之内。南大因为基建需要，曾和他商量迁让，建议由南大另找一个地方建造一所质量相当的房屋互换。但他采取拖延的态度，使这个问题迟迟不得解决。我曾有“秀才遇着兵”的感觉。我离南京前不久曾遇到那位同志。他给我的印象倒不坏。

69. 在过去几年，关于政治和业务相结合的问题，我的思想中是偏重业务的，认为可以把政治统一于业务而在业务中贯彻政治。在实际上是一种轻政治思想。我的思想是怕政治在时间上挤掉业务。这又是把政治和业务看成相对立的机械观点。

70. 前年国务院之下一下子添设了许多部，我在人代会上虽然也举手同意，但心中总有一些觉得不大了解。有个别的部，如林业部，我觉得没有添设必要。当时我曾怀疑中央是否也有因人设事的想法。

71. 我自己有心理学第一的思想。我认为这是我的终身志愿所在，是我的终身事业，不能动摇。别的事可以不干，但心理学一定要干。假如组织上要我不干心理学的事，除非到了战争这种紧急状态之下，我是会有思想问题的。

72. 对于机关精简人员，我觉得几年来常常搞是不大好的。我怀疑，为什么不一次把编制问题好好解决掉而以后即慎重用人，不再产生人浮于事的现象，免得常

常要闹精简呢。

73. 我对一些失业的人感到同情。他们很难在公家机关中找到工作而自己更是没有办法。这些人的就业条件都是差的。但我认为他们总是可以做一点工作的。假如给他们一工作而不好好做或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那是另一问题。

74. 在前年初,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申请入党的时候,我没有及时申请入党,由于①自己觉得一向很靠拢党,和相处的党员同志都关系很好,和在党内差不多了,②怕受不起党的严格纪律,③党处在患难时我不参加,到掌握了政权后再参加,不免有惭愧之感,④怕提出申请不被批准而难为情,⑤有不愿意赶潮流的想法。当然这些想法都是不正确的,所以终究还是提出了申请。

75. 近几年来,我对于开会有厌烦思想,觉得会开得太多了。有些会我认为可以不开,有些会开得太长,不必费那么多时间,有些同志的发言太啰嗦。总之可宝贵的时间浪费不少。

76. 在南京时,对新华日报常常要我稿子已感到厌烦。因为总发现自己的稿子写得不够满意。解放前,总以为自己是能写的人。解放后逐渐觉得自己在写作上是不够条件的,在思想和见解上不够精湛,在写作技术上也不够精炼。因此,信心逐渐低落。有一次我的稿子大部分被改掉了。此后,我更怕写稿。

77. 在解放之初,对有些干部同志随地吐痰并在会客时也赤膊(只穿汗背心)赤足曾有些看不惯,但并没有产生反感。

78. 对于古典著作现代语翻译是怀疑的,觉得翻译的人的理解不可能和古人的原意完全符合,有了翻译本,原著有丧失的可能。把译文附在原文之后,作为一种解释,供读者的参考,那是可以的。

79. 解放后初期,九三组织内只有个别的党员同志。方亮同志是其中之一。那时我对方亮同志的印象是不大好的。方亮同志固然有一些缺点,但我对他的看法也包含我对党对于九三的领导不够重视的成分在内。

80. 开始用榨过油的大豆做豆腐时,曾有些不满意,觉得好的豆腐也吃不到了。此后就很少买豆腐吃,只吃还是用没有榨过油的大豆做的豆腐脑。

81. 在一般铺子里只能买到虫蛀或有烂疤或有其他毛病的苹果。对此曾感到不愉快。一年来铺子里能买到

的花生都质量不太好,大小很不一律,炒得不好。我对这种情况也曾有些不满意。

82. 对高教部、教育部和不少领导同志对于心理学这门科学的不了解和不重视颇感失望并有一些怨气。对于宣传部和科学院对于心理学有一定的重视则感到高兴,觉得不然的话,心理科学的遭受忽视不知要到何时。

83. 对教育部过去培养心理学师资的办法很有意见,认为教育部在这一点上很缺乏应有的远见并对于心理学在教育工作中应起的作用太不了解。因此我对教育部的苏联专家费拉托夫同志也是有意见的,认为他在心理学方面并没有给教育部提供完全正确建议。

84. 教育部副部长韦悫同志原来是一个心理学者,但他对教育部对于心理问题的处理和措施似乎起的作用很少。因此我对他在这方面也感觉到很不了解。

85. 对教学改革是热心的,但对工作量制度的推行虽然也照着上级的指示做,但并不很积极,因为思想上并不完全同意。但并没有把存在的问题好好加以研究,并把自己经过研究的意见反映给上级参考。这说明我对自己的岗位工作仍有“雇佣观点”。

86. 关于心理学,我只是抱怨上级不了解,不支持,而自己很少采取积极的态度把意见向上级反映,争取上级的了解和支持。这也说明我是以“雇佣观点”对待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的。

87. 南京大学的基础是比较好的。但我曾有时觉得上级对南京大学重视不够,好像有偏心。例如别的几个大学都有苏联专家而南京大学则一个也没有(直到我离开时才去一个苏联专家)。因此我对南京大学的积极性也受到影响。

88. 在南京大学工作时,对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虽然口头上重视而思想上并不十分重视。速成中学的问题是不少的,但我并没有积极想办法去帮助解决,也没有积极地进行研究。这表示我对工农出身的干部的培养和成长是不够关心的。

89. 对南京大学少数工农出身的学生在学习上的困难也不够关心。我仿佛认为他们在学习上所遇到的困难是自然的,因此采取一种听其自然的态度。没有很好地把这个问题和培养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工农出身的干部的重要性联系起来考虑。这里也有立场问题。

90. 在制订科学规划时,有一部分医学家和生理学

者对心理学相当轻视。我对他们颇不满意。最初的国家任务表上没有一项任务牵连到心理学的边。我对此曾有一种不光彩之感。

91. 前年上半年知识分子成批入党时,有一个我认为条件不够的人也参加了党。我对此事曾有意见,认为党的组织也会有了解不周的偏差,并认为这种事情对党的威信是有损失的。那时我曾向党内同志谈过这一点,但并没有具体地谈。

92. 曾有一位党的负责同志向我谈起南京大学副校长的人选时,我并没有把自己的看法完全表白出来。这是对党的一次不忠诚的表现。

93. 对培养青年干部,不够积极和热心。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把培干工作提高到壮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队伍或培育心理科学的创作的接班人这样的任务来认识。多少还有资产阶级科学家对年青人的自由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事实上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94. 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敌人这个讲法在逻辑上我是同意的。就一般来说,我认为这样划分的界线也是正确的。但把这个讲法应用到具体的人,我觉得对某些右派分子似乎不完全合适。我在政治认识上还有些模糊不清。

95. 子女报名下放,我是同意的。在农村劳动锻炼一个时期对于他们会有好处,虽然一个儿子的身体不大好,可能吃不起那样的苦。但假如他们要到远地的农村去长期落户,我就会不同意。

96. 对于几年前教育部的警卫森严和传达室的旧衙门气颇感到不舒服。

97. 原从一家分出的高教部和教育部仍在一个大院子内办公,但各自为政,丝毫不互通有无(例如心理学干部的分配和使用),好像互相之间有一座铜墙铁壁。我觉得这不是社会主义应有的现象。

98. 我认为把中等学校师资的培养和综合大学教育分开办理是不适当的。分开办理有好处,但也有坏处,但坏处多于好处。这是一个应该好好研究的问题,而许多同志好像把现行的制度当作天经地义。

99. 把儿童入小学的年龄定为七足岁,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恐怕也是十足的教条主义的一例。我国一两千年来的都是使儿童在六足岁左右就开始受小学教育。这个老经验为什么一下子就抛弃掉,我不明白。

100. 我过去基本上是以个人自由主义对待“朋友”

的,对他们在政治上很不关心。有几个“朋友”都走上了错误的政治道路。假如我对他们多关心一些,可能会好一些。这种对人态度和社会主义更是不相容的。

101. 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中,对于劳动产生人的理论我还没有搞通。假如劳动产生人,劳动又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现在的猿类不能产生劳动?我觉得人才能够劳动,所以人产生劳动而不是劳动产生人。这是我当前待解决的一个思想上的疑问。

102. 我没有下坡思想或黄昏思想,但我有迟暮思想,觉得岁月一天天消逝,必须急起直追,加倍努力,对社会主义建设多贡献一点力量。生逢伟大的历史时代,岂可白白渡过!

103. 双反运动中,心理所有一部分人把所内研究人员划分为理论派和实践派,我不同意这样的讲法,认为强调结合实际,强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行了,理论派和实践派的划分并不能正确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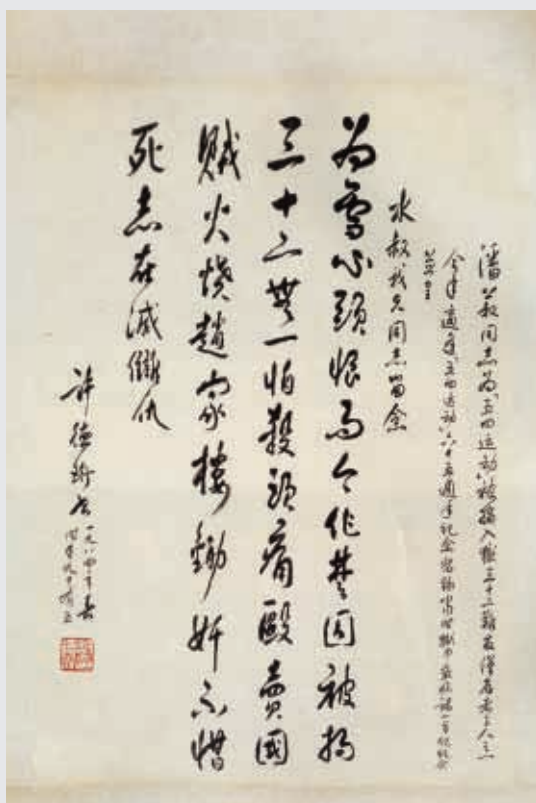
104. 我觉得主张脱产办社的同志是不切实际的,假如社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中常委的大部分同志都能脱产,当然是理想的,但这是可能性很少,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同时,一件事情不会只有一种办法,我看不出为什么业余办社一定不可以。

105. 自己不长于言辞,因此颇不愿意听道理不多而夸夸其谈的人讲话,更不愿意听道理不多而啰嗦不已的人讲话,我很欣赏能讲话的工农同志,觉得他们有感情有见解,没有虚夸之辞,形式和内容统一,是讲话的“上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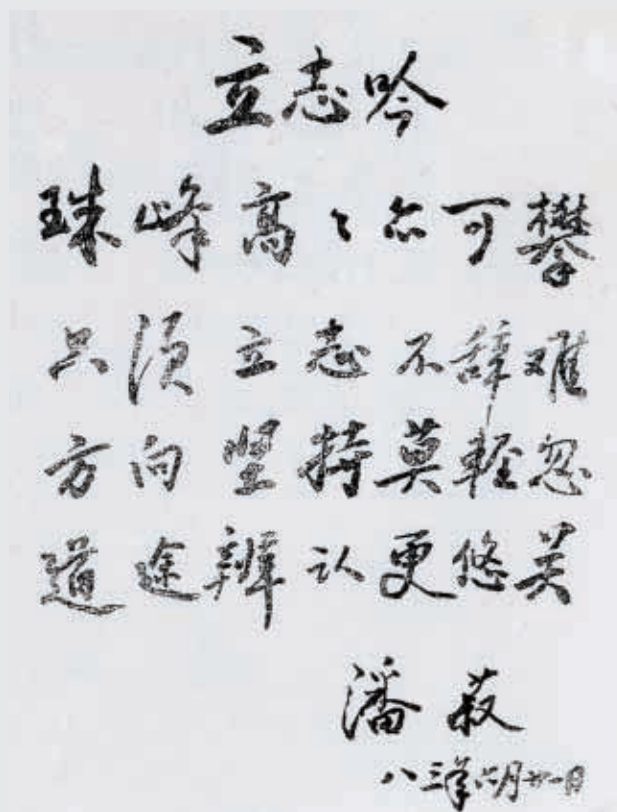
106. 在整风的上一阶段,我在社内和所内写的大字报在数量上还是不够的,有一些可以写的意见还没有写出来。虽然有时间上的客观原因,但同时也是我的劲头还不够大的表现。

107. 在整风开始的时候,我虽然没有怕火燃烧的顾虑,但没有及时采用适当的形式(如大字报)表示我的决心。因此所在机关内的同志可能没有能完全破除顾虑,大胆向我提意见。因此,我的引火烧身是不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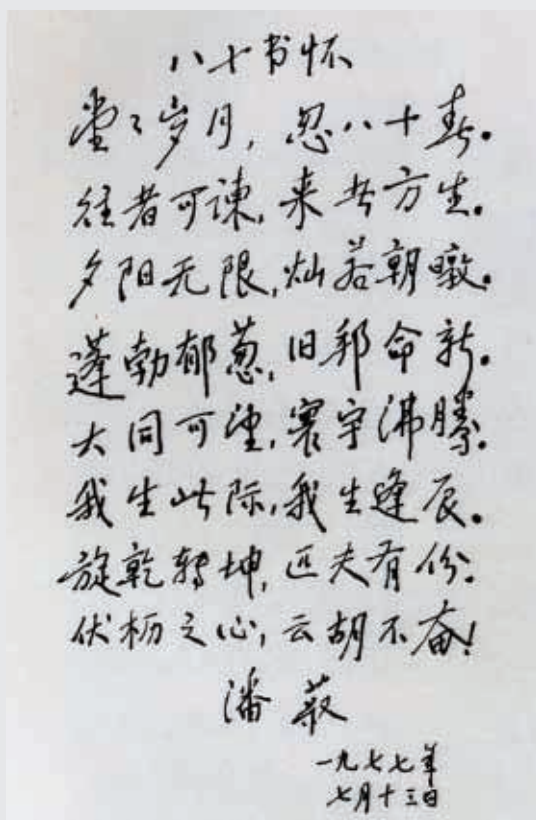
108. 心理所内的同志向我提的许多意见,其中有一些我觉得是不切当的,但我一般都不作答辩以免影响大家的劲头,但我对其中少数意见仍不免感到不快,甚至当时颇有激动。这说明我在对待别人的意见上还有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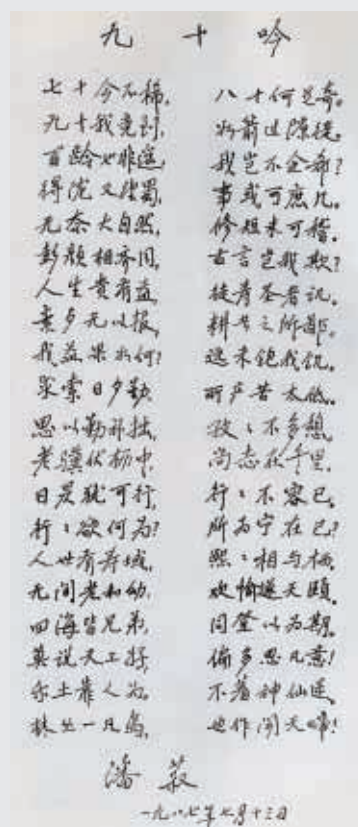
1984年春，许德珩书录当时《狱中感怀诗》一首送呈潘菽，纪念一起参加五四运动并被捕入狱65周年。



潘菽《立志吟》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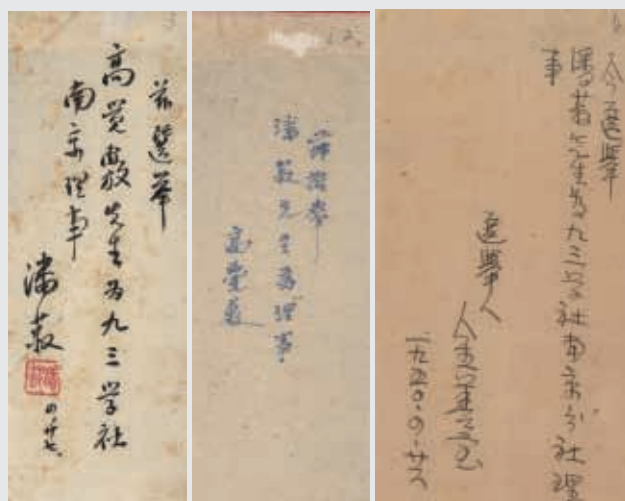
潘菽《八十书怀》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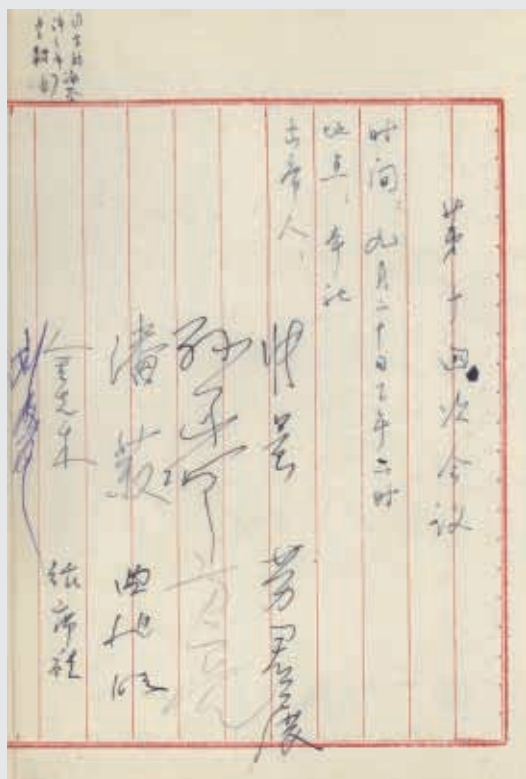
潘菽《九十吟》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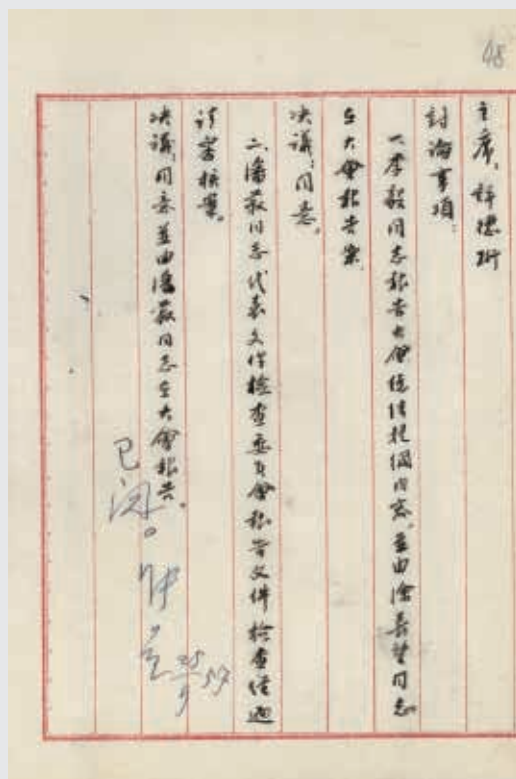
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前夕，潘菽赴苏联参加巴甫洛夫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此为当时所用护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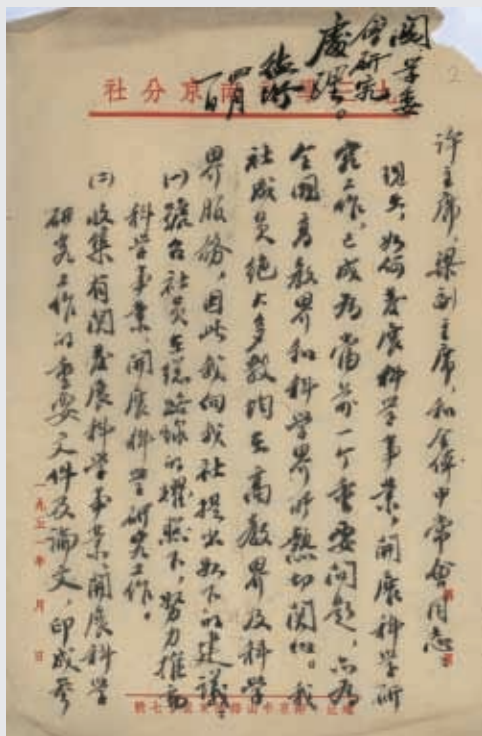
1950年，推选潘菽、高觉敷为九三学社南京分社理事的选举单（原件现藏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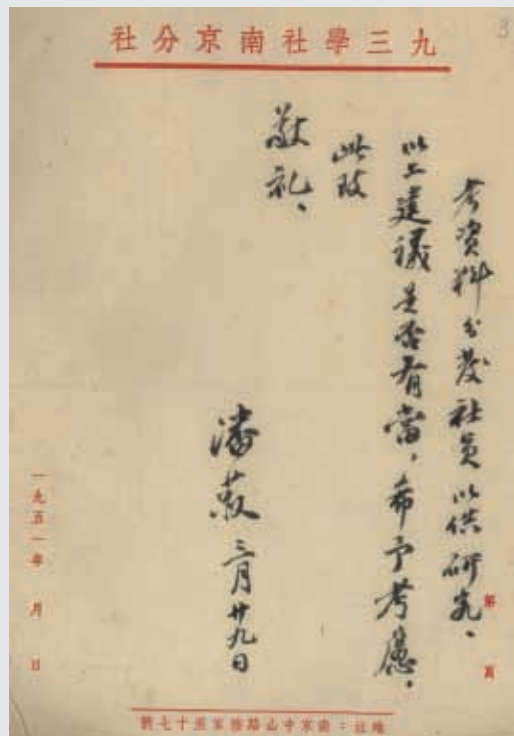
1957年9月20日，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工作委员会第14次会议记录，潘菽签名与会，并代表文件检查委员会报告文件检查经过（一）（原件现藏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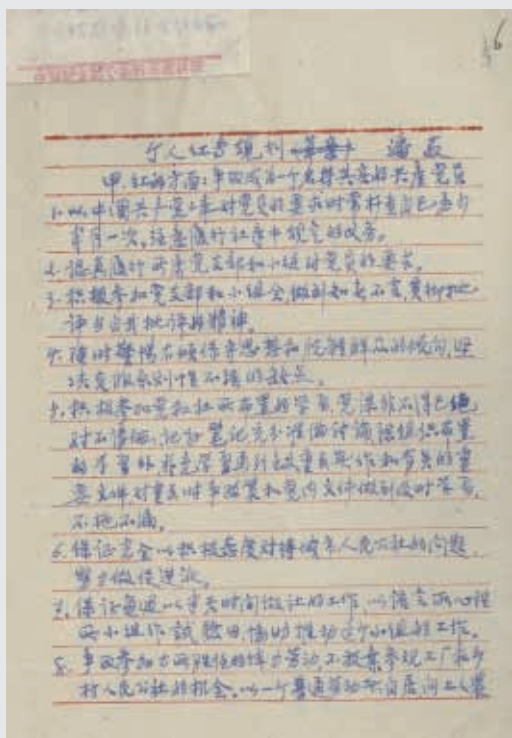
1957年9月20日，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工作委员会第14次会议记录，潘菽签名与会，并代表文件检查委员会报告文件检查经过（二）（原件现藏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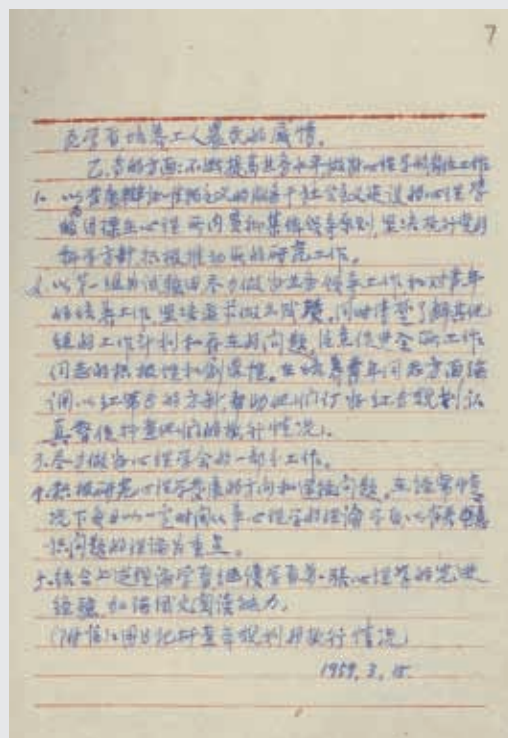
1951年3月，潘菽致函许德珩、梁希，商讨如何号召九三学员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一）（原件现藏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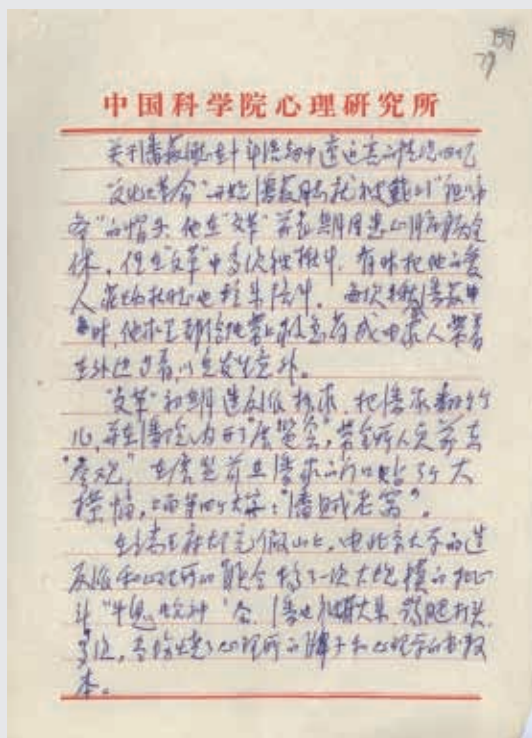
1951年3月，潘菽致函许德珩、梁希，商讨如何号召九三学员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二）（原件现藏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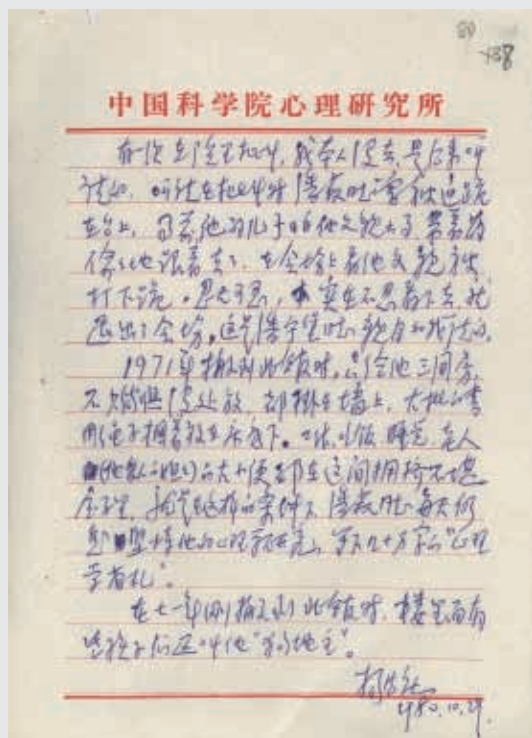
1959年3月，潘菽撰写的个人红专规划（一）（原件现藏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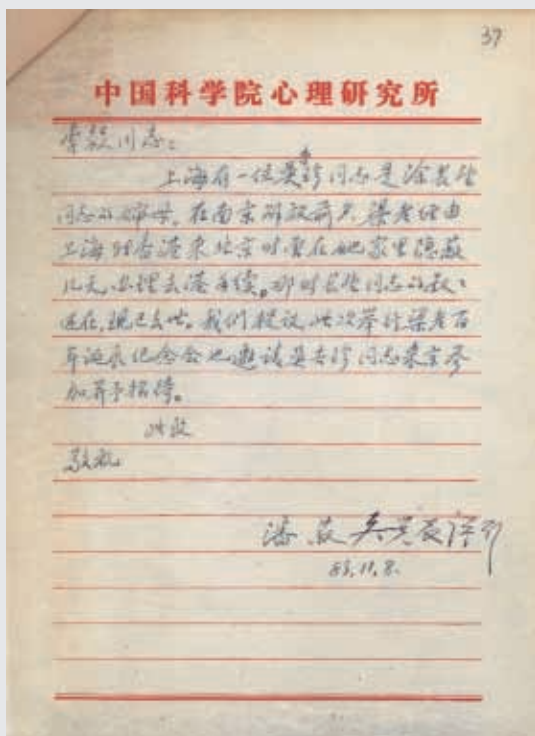
1959年3月，潘菽撰写的个人红专规划（二）（原件现藏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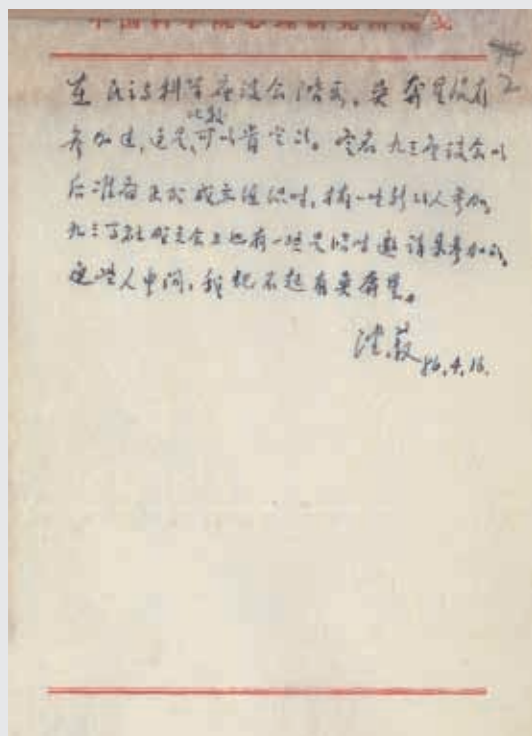
杨德庄回忆潘菽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一）（原件现藏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



杨德庄回忆潘菽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二）（原件现藏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



1983年，潘菽关于梁希百年诞辰纪念会致李毅的信（原件现藏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



1986年，潘菽关于九三学社创建初期的回忆片断（原件现藏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

题。

109. 我喜欢地方戏和民歌，觉得它们富有真实的感情和与这种感情相称的形式，京剧是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的，但在许多地方也同时带来了形式化，和昆曲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京剧在服装上的“繁文”“缛节”，我觉得是最大的缺点，有些地方戏趋向于京剧化，我觉得不好。

110. “百花齐放”的政策是先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政策是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的政策提出来时我完全拥护。“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来时我一方面很拥护一方面颇有怀疑，恐怕引起思想混乱。现在看来，我觉得“百花齐放”的政策贯彻得很好，而“百家争鸣”的政策则贯彻得还比较差。

111. 我不大喜欢争辩。但这种习惯有时会混淆是非，对于明辨是非是不利的。到了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这种出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习惯更不合适，更有害处了。

112. 最近听到北京郊区农民的小孩子有个别的有时候会吃不饱或者根本没有吃饭而饿着一天的肚子，而感到疑惑，不知这究竟是怎样一个问题。

113. 下放干部时，我也报了名。在一定条件之下，我也愿意到农村去生活一个不太长的时间，但我报名时的心情是明知不会被批准而只是“带头”一下的。我这样做是否对，我自己还感觉到是一个疑问。

114. 对于参加天安门观礼，我近来感到兴趣不大，觉得所看到情况都差不多，而立着一个上午并有时还受到雨淋和太阳晒，有些受不住。这也应该说是一种暮气的表现。

115. 去年6月将出国时正逢整风的时候，所党支部要曹日昌同志留下来照顾所内整风工作，我却强调要曹日昌同志一起出去。这一方面说明我缺乏组织观念，另一方面说明我仍重视业务，忽视政治。这里面也包含有我依赖曹日昌同志的思想而缺少自己克服困难的精神。

116. 我在所内受到的待遇是比较特殊的，如办公室和宿舍内的家具都比较好而齐全，我虽然已感到满足而没有更多的要求，但也并没有“受之有愧”的感觉，好像这是当然的。这种思想已是官气的冒头。

117. 国庆和五一的庆祝集中在天安门，大部分市

民都不能看到，更不能参加。我觉得这是美中不足之处，除了天安门的集中庆祝外，是否也可以同时分区举行庆祝，使更广大的市民都受到教育呢？

118. 遇到蒙古和朝鲜的外宾时，在意识深处仍有一种大国思想，和别人闲谈时曾表示一种看法，认为蒙古人民共和国还是和中国联合在一起比较好。

119. 想到过去帝俄曾从帝制时代的中国夺去西北和东北边境大片土地时，还有一种“耿耿于心”的感觉，坐火车经过贝加尔湖南岸时，脑中总浮现此处曾是中国土地的想法。此种想法和上一条的想法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120. 回忆在南大工作时，遇到问题很少去和党委商量。在一天到晚的种种考虑中很少想到党委，这事实说明我的组织观念和接受党的领导是很差的。我和党仿佛只是一种雇佣关系，没有做到主动地真正亲密地靠拢党。

121. 我不喜欢争辩，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表现，在鸣放期间，我对许多右派分子的言论，除了荒谬绝伦的（如葛佩琦和储安平言论）而外，虽然不同意，但也觉得可以成为一种意见，这说明我和错误的言论有和平共处的自由主义思想。

122. 在去年社中央召开的高等学校问题座谈会上，我发表了很错误的言论，丧失了政治立场的言论。我常埋怨社中央，特别是许主席，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个误人不浅的座谈会，而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是自己立场上的问题。这种政治立场的不稳迟早是会暴露出来的，早暴露出来还是比较好的。

123. 在上条所说的一次座谈后，我就避免参加以后一系列的座谈会以离开“是非之场”。但这只是消极态度，没有很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积极参加斗争。

北京分社早期社员名录(四)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服务机构	住址	社内职务	备考
冯雨荪	男	31	西安	北京石油学院炼制系石油工 学教研室讲师			55.9 自西安调来
谢守铭	男	29	四川	清华数学教研组进修			55.10.15 自重庆调来
王卓然	男	61	抚顺	国务院参事			55.10.18 自天津转来
徐开礼	男	28	四川	地质学院进修			55.10 自重庆调来, 56 年7月19日调回重庆
刘绍唐	男	39	哈尔 滨	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工作			55.10 自哈尔滨调来
冯泽芳	男			林业部作物栽培训练班进修			55.11 自南京调来。 1958.1.17 复由南京调来。
李澈	女						55.11.24 调来
高振业	男	40	河北	北京教育行政学院进修			55.12 自重庆调来
王裕樵	男	33	上海	军委外语学校教授	北京邮箱 335 号		55.12 自张家口调来
谢震来	男	50	浙江	军委外语学校教授	北京邮箱 335 号		55.12 自张家口调来
李赋宁	男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55.12 通过
江作昭	男			清华大学土木系讲师			55.12 通过
李传信	男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助理系主 任			55.12 通过
孙家圻	女	36	江苏	清华大学			56.2 自南京调来
孙定外	男	38	浙江	中央建筑工程部设计总局			56.2.22 调北京
夏纬瑛	男	61	河北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56.2.22 由西安调北京
周炜	男	33	山东	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56.2.22 由南京调北京
周正谊	男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56.3.16 由无调此
刘静宜	女	30	江苏	科学院			56.3.20 由沈调此
谢家荣	男	58	江苏	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			56年3月22日 通 过
张庚虞	男	57	河南	地质部技术员			56年3月22日 通 过
王晓青	男	56	湖南	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工程师			56年3月22日 通 过

徐仁	男	46		地质部矿物研究所研究员兼 粉末研究室主任			
王曰伦	男	54		地质部矿物研究所研究员兼 矿床研究室主任			
杨文衡	男			河北保定农学院			
赵铁铃	女	29		石油学院化学教研室讲师			
汤楷孙	男	37		石油学院储运教研室主任			
凌君达	女	36		石油学院物理教研室讲师			
苏良赫	男	46		地质学院教授			
刘冠军	男	48		地质学院体育教研室主任			
崔毅忱	男	53		北京市结核病院院长，军委 后勤部空军总院特约医师			
朱聘	男	42		北京医学院卫生系流行病学 教研组主任兼副教授			
楼之岑	男	36		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副教授			
庞貽慧	女	34		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讲师			
刘书田	男	39		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讲师			
汤汉芬	女	42		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讲师			
李大方	男	55		九三学社组织部干事			
高之佩	男	38		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宣传干事			
牟小东	男	35		九三学社科学文教科委会干事			
彭景文	男	52		九三学社总务组长			
乔敬淑	女	42		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干事			
刘曾复	男	41		北京医学院生理教研组副教授			
梁濂	男	50		北京医学院校医			

黄凌	女	40		北京医学院副教授兼副主任			
陈德崙	男	40		北京医学院副教授			
程希孟	男	5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室主任			
王效曾	男			私立西北诊疗所医师			
梁品如	男			中央戏剧学院硬气工作			
颜本崧	男			北京设计院工程师			
胡连璋	男			北京上下水道工程局八级工程师			
郑中立	男	43		北京医学院耳鼻喉副教授兼研究组副主任			
李凤鸣	女			北京医学院眼科副教授			
胡善生	男			北京医学院耳鼻喉副教授			
郑芝田	男			北京医学院内科副教授			
王潔泉	男			北京医学院口腔系教授整形外科主任			
李涛	男	55		北京医学院教授			
钟之琦	男	53		北京医学院口腔系教授			
张乐天	男	56		北京医学院口腔系教授			
杜秉正	男			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讲师			
郑裕崢	男	41		北京市卫生工程局技术室副主任			
崔式珍	男	47		北京市设计院工程师			
栗培光	男	39		北京市设计院工程师			
王民范	男			北京医学院口腔系副教授			
胡郁斌	男	42		北京医学院口腔系教授			

陈集舟	男	36		北京医学院皮肤性病科副教授			
邓金鏊	男	48		北京医学院教授			
钟间	男	50		高教出版社编审			
皮筱韬	男	39		高教出版社助编			
乐汝书	男	38		清华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李克群	男	35		清华大学讲师			
刘世杰	男	42		北京医学院副教授			
王志均	男	46		北京医学院生理教研室教授			
孙家慰	男	44		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			
张之芬	女	34		卫生部药检所技师			
潘崇熙	男	35		人民卫生出版编辑			
王福溢	男	45		人民卫生出版编审			
黄曰骧	男	57		人民卫生出版编辑			
周崇德	女						
傅正愷	男	41		中央人民医院内科主任			
李家忠	男	41		北京医学院外科副教授			
秦振庭	女	42		北京医学院儿科教授			
袁见齐	男	47		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系主任			
薛琴访	男	46		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系主任			
许保玖	男	36		清华大学土木系副教授			
董钧谋	男	53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科员			
丁延衿	男	42		北京医学院生化教研组副教授			

未完待续

褚辅成史料搜集、研阅回顾

王天松

退休前五年,将历年来挖掘、搜集的褚辅成先生(以下尊称褚辅老)史料,进行系统研阅、整理,最后形成褚辅成研究系列丛书——《褚辅成文存》、《褚辅成文存摭补》、《褚辅成年谱长编》三书,并于退休前结集出版。要说从搜集史料开始到最后付梓,则前后经过了20年的时间。因为有一份本职工作,所有挖掘、搜集、整理、研阅史料的工作,只能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进行,非常艰辛。特别在最后成书的5年中,由于想要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出版,努力赶时间抓进度,造成体力与精力上的严重透支,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本来已在日趋衰老中的身体。上述三书中最后一本《褚辅成年谱长编》出版至今虽已两年(笔者注:此文撰写于2013年),但身体、身心的极度疲劳仍未得到有效解除。应九三学社嘉兴市委员会、政协嘉兴市文史研究会之约,将前后20年来挖掘、搜集、研阅褚辅老史料的过程作一大概的回顾。

一、褚辅老历史地位和研究状况

褚辅成(1873-1948),字慧僧,别号褚南湖,是从江南水乡——嘉兴走出去的历史文化名人。

1904年,褚辅老留学日本。1905年在日本东京加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同盟会,进行反清革命,至民国末(1948年),一生历经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反袁斗争、护法运动、癸亥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四一二清党、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三年内战等。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中都有他的身影和声音,且在有些事件的特定时段,还处在领衔或担纲的地位。“作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单就他一生中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并领导浙江地区的反清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被捕入狱而险遭杀害,参与护法运动而为护法国会的主要领导人,冒死掩护韩国流亡政府领袖金九,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这几件大事,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就不可忽视,褚辅成足称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活动

家。”(邵鸿《褚辅成年谱长编》序)他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民主宪政的先行者……九三学社的主要创始人”。(刘冬生《褚辅成文存》序)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对其生平少有宣传介绍,有关研究亦十分缺乏,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邵鸿《褚辅成年谱长编》序)有关褚辅老的史料长期以来尘封于民国时期的各种报纸、刊物中,或沉淀于全国各大档案馆的档案里,或散落遗存在坊间有识之士的书夹内,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的挖掘、搜集、整理、研究、展示,对他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人们对这位嘉兴籍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的生平、事迹、思想知之不多,了解甚少,有的甚至被讹传。

二、褚辅老研究的起因

想要研究褚辅老的想法,最早产生于1991年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出版后。该书所有23篇文稿,都是褚辅老的后人、学生、同事或文史爱好者所撰写。拜读之余感到,文中对褚辅老一身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虽都有提及,但在谈到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时往往又都一笔带过,缺少具体史料的支撑。由此想到,能否顺着此书所提供的资料线索,进一步搜集褚辅老的资料,编写一部史料较为丰富、系统的书——如《年谱》之类的。但那时的想法不想明示于人,只在脑海中一闪念瞬间就过去了。原因很简单,自己作为一名长期在企业工作的科技人员,虽然平时有爱好历史(近代史)的业余兴趣,但过去从无有关史学方面的基础训练,也没有文史方面的写作积累,要想做成这件事,难上加难。但那时我从企业调入统战系统机关已有三年多,每年在列席嘉兴市政协全会或在平时,每每听到不少政协委员和社会有识之士呼吁政府要重视对褚辅老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和纪念,而且这种氛围一年比一年强烈时,又催醒了脑海中曾经有过的瞬间闪念,决定不妨试一试,先从积累史料开始,慢慢去做。由此在后来的10余年中,我利用一切机会如外出开会、考察、学习以及节假日里

留意搜集有关褚辅老的各种史料，包括购买一些近代史中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书藉和已经出版的一些专家、学者们的研究专著，从中发现史料线索和汲取写作营养。

三、褚辅老史料征集过程

关于征集褚辅老史料的整个过程十分不易，搜集难度极大。从1991年手头仅有一本嘉兴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的《褚辅成专辑》开始，到2006年8月积累起比较丰富的史料，开始动笔整理、研阅、撰写，期间经过了15年的时间。之所以征集难度大：一是史料零散、缺乏系统。由于褚辅老一生不写日记、不撰回忆录，他在世时也没有对自己的文字进行过结集汇编，更没有褚氏家谱之类的现存家史资料。所有的史料均分散在民国时期各种书刊、报纸、各地档案馆的档案以及散落在坊间有识之士的手中，呈分散、点滴的无序状态；二是史料时间跨度长：褚辅老一生的政治生涯历经晚清与整个民国时期，时间跨度超过半个多世纪；三是褚辅老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之多，几乎历经清末到民国末所有各大历史事件，可说无役不从，史料极其丰富。四是史料分布区域广。褚辅老长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北到北京、天津；南达广东，云南；西到重庆、成都；东至上海，还有江浙地区等。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如上所述，我不是一个文史工作者，又仅凭一己之力，在业余时间里进行，除了付出时间、精力，还要有经费保障，我一个人做能行吗？后来的征史过程让我偿到了艰难与不易。征集的这些史料很多都不是人家白白提供给你的。在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查阅资料，那怕复印一张纸，都要纸张费、复印费，对很多原始、珍贵的史料还要出查档费等。现在回想起来，这10多年的史料搜集犹如大海捞针。

史料的搜集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初始阶段

初始阶段，由于不懂得如何去寻找、发现史料的线索，到什么地方去搜集史料？故收效不大。开始时只要见到文章中有褚辅成三个字，就把它收集下来，见一点收一点，东奔西走，积极性很高，因漫无目标，效果不大。当初搜集到的大量的都是别人发表在报纸、刊物上的一些文章等，见到就复印或剪辑下来，前后收集了厚厚的六大本，报纸收集了上百份。还购买了不少的历史

书藉，然后认真阅读。这个初始阶段大约有10年的时间。2000年前党派机关还没配电脑，史料信息来源少，搜集面受到限止，史料质量不高。后来机关配备了电脑，资料搜集面虽有所扩大，但能收集到的仍是以别人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为主。从史料的实用角度而言，当时所有收集到的这些资料后来都没能直接用上。但通过认真阅读这些文章、书藉，得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收获：一是对褚辅老的事迹和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丰富了自己的近代历史知识。二是存疑专研。当时有很多的文章资料一时还看不懂，特别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背景等搞不清。褚辅老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渊源、交往不清楚，有很多的人名过去连听都没听到过，其实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大大的有名的人物。还有，很多的历史用语如“护法”、“护法国会”、“旧国会、新国会”、“癸亥政变”、“曹锟贿选”等等，不知道它的内涵。归结起来是缺乏史学基础所至，但也激发了我自学的冲劲，进行自学，一点一点汲取、充实自己的史学营养。

2、中期阶段

从2003年以后到2006年这段时间，史料的搜集进入了一个快速见效阶段，不断征集到有关褚辅老所经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始文献资料，史料的质量大大提高。其中很多是得益于九三学社中央两位历史学家——九三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先生、九三学社中央原研究室主任岳庆平给予我的指导、点拨。再结合自己前期史料搜集的实践经验，制订出一个比较详细的史料征集计划。锁定目标，全力进行。一是到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天津、重庆、万州、云南（昆明）、广州等地的省、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找史料。这些地方都是褚辅老较长时间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其中去得最多的是上海、重庆、天津、北京，期间有很多次都是自费出去，从茫茫史海中寻找片纸只语、点滴资料。就这样在天津博物馆查到了褚辅老任广州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前后的一批函电等；在上海档案馆、图书馆，查到了褚辅老创办上海法学院的档案资料及《货币革命十讲》。又查到了褚辅老等发起成立全浙公会的史料等；在重庆、万县档案馆、图书馆找到了褚辅老任职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一些提案、演讲、访谈等；二是联系在北京、上海、嘉兴等地的褚辅老的后人，反复了解其家史。他

们为我提供了褚辅老生前所写的一批家信和《抗战八咏》的手稿等；三是委托褚辅老工作、生活过或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的九三学社组织和社员帮助查找，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在九三学社金华市委、九三学社丽水市委帮助支持下，联系采访了当地对褚辅老史料有所掌握并熟知浙江抗战史的老同志，挖掘搜集到了1937年底至1938年初褚辅老与中共地下党骆耕谟合作共事、并肩抗日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后来专程去北京拜访了时已95岁高龄的骆耕谟教授。在九三重庆市委、万州区委组织及社员的帮助下，挖掘搜集到了九三学社成立前后有关九三学社成立及褚辅老的珍贵史料等等；四是全力查阅民国时期的一些重要报纸、刊物。从2003年开始，花了3年多时间，系统查阅了每日八版的上海《申报》，中共汉口、重庆全部《新华日报》，部分上海、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新闻报》、《时报》等。特别详细查阅从1904年到1948年的上海《申报》，收获巨大；五是自费从网络旧书店上购买了400余本史料书藉、杂志，有的那怕其中有一张照片或几句话，只要是与褚辅老有关，尽管价格不菲，亦照购不误，复印档案史料、报纸达3000余份。随着史料搜集的深入，信息量也越来越多，搜集的方法和技巧更趋熟练。在与史学界专业人士的交往中，史学知识也有了很大的长进。后期还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以及朋友们的无私支持。这一时期的收获奠定了后来《褚辅成文存》、《褚辅成年谱长编》编撰所必需的史料，也为下一步研究工作打下很好的基础。虽然中期阶段史料的搜集收获巨大，付出的时间、精力、费用最多，但也严重透支了身体。

3、补征阶断

从2006年8月着手，系统研阅整理史料，开始编撰《褚辅成年谱长编》，其间与《褚辅成文存》的编撰同步进行。当年谱的编撰进行到广东“护法国会”时期，发现这一重要历史时段的史料严重不足，必须补征，否则无法展示出褚辅老作为广东护法国会副议长（后期代理议长）时全力扶助孙中山先生进行护法的重要史实。由于经过10多年的努力，建立起了一个史料征集的网络，有了一些史学界朋友的帮助，征集的方向明确，史料来源信息渠道畅通，在不长的时间里很快征集到了褚辅老在广东护法国会时期的历史资料，弥补了这个阶段

历史资料的不足。但由于史料的珍贵，费用亦是不菲。随着年谱编撰的进展，以后又陆续补征了各个历史时段的一些史料，如1946年九三学社成立前后的珍贵史料，又如1947年褚辅老在上海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前后的重要史料等，都十分顺利。

四、体会与感想

作为业余作者，在工作之余去做这样一件事情，难度很大，体会最难、最缺的有三：一是史学基础差，但促使我首先是选择了坚持、不放弃；其次是甘愿付出，包括时间、精力、自费付出；三是坚持自学，不耻下问，向别人请教，向专家学习。从九十年代初以来曾有四次调动工作岗位，但一直没有放弃做这件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要想把这件事做好，也只能耐住寂寞，远离诱惑。

一部中国近代史极其深邃庞杂，褚辅老又是一位人生经历极其丰富的历史人物，对于我这个无论过去在校所学还是调入机关后所从事的工作，与史学专业相去甚远的史学门外汉来说，要做成这件事难度确实很大，但整个史料的挖掘、搜集、整理、研阅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存疑、请教、研究、提升的渐进过程。从最初对褚辅老有一种神秘感，到后来随着对人物的人生经历、言论思想、历史功绩等轮廓逐渐清晰，对他的敬仰之情也油然而生。褚辅老是我们九三学社的主要创始人，作为九三学社社员的我，对褚辅老的敬仰之情无形中转变为动力，一定要坚持做下去，千方百计地想要把这件事做成。目前已出版的有《褚辅成年谱长编》、《褚辅成文存》、《褚辅成文存摭补》三本书，力图用大量的原始资料去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褚辅成。

褚辅老从1904年东渡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进行反清革命，这段历史已远去100多年，然而长期以来缺少对他的系统研究，他的有些历史功绩成为了别人的陪衬，有的主次颠倒，有的张冠李戴，有的被矮化、虚化，有的被讹传等等，他为国家、民族所作出的历史功绩长期被埋没。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要追寻历史的真实足迹，很多事件都绕不开他，绕开他就失去历史的真实。我以为，他的言论、文字、事迹在当今中国尤其在九三学社是应倍加珍惜的一笔遗产，挖掘、研究这笔遗产，从中梳理出有益的精萃，并总结历史经验教

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褚辅老从 1948 年谢世距今也已 60 多年，当今时代较之 60 余年前甚至改革开放的 30 余年前，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人们可以而且应该超越党派成见与感情色彩，站

在国家、民族利益和爱国主义的立场上追溯他的历史功绩，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

在此，要感谢所有曾经帮助、支持过我的组织和个人。不确之处，敬请指正。

（本文作者为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迦陵是九三学社成立时的理事，在当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然其相关资料甚少。九三学社重庆市委郭祥同志撰写的《九三学社创始人复员考略》一文，对 16 名理事、8 名监事复员进行了详细调研，张迦陵是情况不明者之一。1990 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秦国生和胡治安主编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政纲、人物》一书，刊登了我社 338 位人物，书中未见其人。写本文时，因未能查看清华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东吴大学等相关档案，可能存在偏差甚至错误，欢迎同仁补充、指正。

张迦陵，曾用名张国辉¹，男，1906 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30 年广东梅县东山中学毕业，1934 年国立清华大学毕业，1935 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大学院读研究生，1937 年“七七事变”后回到梅县，与梅县留日同学发起成立“留日同学会”，在“梅县民抗会”中任秘书，1938 年恢复中共党籍，1941 年以后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东吴大学任教。1946 年当选为九三学社理事。1950 年在北京合作局合作干部学校工作，任九三学社总社宣传



委员会委员。不久于北京病逝。按时间顺序略述如下：

1926 年下半年，在梅县东山中学校（以下简称“东山中学”）读初三，和廖立群（时任学生会主席及东山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²）是同班同学³。当时是国民党党员。

一次张迦陵带丘克辉（东山中学初一学生，后任民盟中央委员）到国民党梅县党部见到张维（国民党左派、中共梅县特别支部书记）。张维对张迦陵说：“今天有好多人都要来参加国民党，我们要进行考试，你来主考”。张迦陵问雁洋小学校长李六涯：“什么叫三民主义？”李答：“作奋斗论。”

又问：“国民党建国大纲是什么？”李又答：“作努力论”⁴。

1927 年，张迦陵与廖秉庸、叶艳举等为东山中学学生会干部（廖立群任学生会主席）⁵。6 月，东山中学被国民党当局封闭⁶。

1928 年 3 月 26 日，东山中学重新开学⁷。学校党团组织秘密活动。张迦陵与廖立群介绍丘克辉入团。张迦陵是中共党员⁸。

1. 谢健弘：《“留日同学会”及“县民抗会”的回顾》（抗战时期的梅县 50 周年专辑）中，使用“张迦陵（张国辉）”；《丘克辉同志的回忆》（梅县市党史资料，第 14 期）中使用“张国辉（即张迦陵）”。

2. 广东东山中学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东山英烈》，2001.03，第 73 页。

3. 《梅县市党史资料》1984，（第 14 期），第 27 页。

4. 《梅县市党史资料》1984，（第 14 期），第 27 页。

5. 《梅县市党史资料》1984，（第 14 期），第 27 页。

6. 《叶剑英研究》，1996，（第 1 期），第 146 页。

7. 杨力翔著《叶剑英与东山师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08，第 76—77 页。

8. 《梅县市党史资料》1984，（第 14 期），第 29 页。

有一天晚上,张迦陵与廖立群通知丘克辉到东山岙后会面、谈入团问题。丘克辉、张思谨、陈新生三人由卢伟良领导入团宣誓,并指定丘克辉为书记,陈新生为组织,张思谨为宣传。当时,张迦陵在场¹。

东山中学复校后,秦元邦(国民党左派、中共党员,后任民革第二至六届中央委员)担任东山中学训育主任。主要任务是通过地下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强宣传、组织活动,在地下党的指导下把学生会组织起来。在组织学生过程中,地下党所领导的张迦陵与赖兆新、叶艳举、杨益三、陈超凡、张廉、廖水和(廖伟)、张春光等与国家主义派的头目管湘湖的走卒张用、吴宴兴等一伙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激烈的斗争²。

按:东山中学于1924年采用新学制(三三制,中等教育初级三年、高级三年)³。据此,张迦陵高中毕业时间应为1930年(1927年东山中学虽横遭封闭,被迫停办⁴,高中毕业时间并没有后延,见下文)。

1930至1934年,张迦陵在国立清华大学学习。1934年,张迦陵赴日本。

据第十版《留日学生名簿⁵》记载:张迦陵于昭和十(1935)年以清华大学出身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大学院。这说明,张迦陵在国立清华大学学习时间为1930年至1934年。1934年,张迦陵鼓励谢健弘前往日本留学,与谢健弘一道开伙⁶,说明1934年,张迦陵已到日本。1935年入东京大学一说当可成立。另一说法:第十四版《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名簿⁷》记载:张迦陵于昭和十一(1936)年以清华大学研究院出身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大学院,与上文,1934年同谢健弘在日本一道开伙在时间上相矛盾。综上:采用张迦陵在清华大

学读四年即1930-1934年,1935年入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一说。另,《留日学生名簿》出版于昭和十一年,即1936年,时张迦陵30岁;《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名簿》出版于昭和十五年,即1940年,时张迦陵34岁,知其1906年出生。

1936年春,张迦陵和朱斐如作为东京帝国大学代表参加“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⁸。

该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当时留日学生群中影响颇大。联合会出版《会刊》,是全体留日进步学生喜读的刊物。该会曾先后多次派出代表前往东京警视厅营救爱国被捕的留日学生。鲁迅先生逝世,该会在东京组织追悼大会。同年暑假,该会与中华留日剧人协会合作,在东京公演由夏衍改编的话剧《复活》连演四天,场场满座⁹。

1936年6月20日,广东留日同学会在东京举行1936年度全体会员大会,改选执监委会。张迦陵当选为监察委员¹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迦陵与谢健弘、刘渠(清如)、陈超寰、谢镇军、郑天任等由日本回到梅县,共同发起成立“留日同学会”。与家乡同胞一道共赴国难,共挽民族危亡¹¹。

回到梅县后,张迦陵与刘渠、谢健弘、郑天任、谢镇军等很快就团结了梅县籍留日同学40多(一说“30余人”¹²)人,商议成立“梅县留日同学抗敌同志会”。张迦陵等找县长梁翰昭,经县长同意,(于1937年秋¹³)在东湖路挂起了“梅县留日同学抗敌同志会”(后来官方将“同志会”改为“后援会”)的招牌,时人简称为“留日同学会”。“留日同学会”挂牌后,认真做好留日老前辈和文教界名流杨徽伍、侯过、古直、黄枯

1. 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梅县大坪镇委员会编《怀念卢伟良》1997.07.第21-22页。

2. 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梅县大坪镇委员会编《怀念卢伟良》1997.07.第137页。

3.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网站 <http://www.dsms.info/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9&id=887>

4.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网站 <http://www.dsms.info/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9&id=887>

5. 财团法人日华学会学报部编《留日学生名簿》第十版,昭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梅县——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1995,第41页。

7. 财团法人日华学会编《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名簿》第十四版,昭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惠州市惠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惠城文史资料》第12辑.1996.01.第89页。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惠州市惠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惠城文史资料》第12辑.1996.01.第89页。

10. “张迦陵抵港之谈话”《香港华字日报》1936.8.18第十版,香港公共图书馆·多媒体资讯系统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梅县——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1995.08.第41页

12. 闽粤赣边区党史编审领导小组著;林天乙主编《中共闽粤赣边区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06.第359页。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梅县——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1995.08.第36页

桐、丘勤修等 20 多位教授、学者的理解与支持。期间，张迦陵曾到东山中学向教职工学生演讲民主团结、抗日必胜的道理¹。

1938 年，张迦陵恢复中共党籍，加入梅县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党小组²。

1938 年 1 月，中共梅县中心县委邀集张迦陵、谢健弘、刘渠、郑天任 4 人到张惠镛（张琛，笔名张定宗，梅县人，1937 年入党，曾任梅县中心县委统战部部长³）家。梅县中心县委书记李碧山宣布中心县委决定：恢复张迦陵、谢健弘、刘渠、郑天任 4 人的中共党籍，组成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党小组⁴。之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张迦陵等利用各自的社会地位和各种关系，在梅县党、政、军各界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⁵。

1938 年初，按照中共梅县中心县委决定，利用“梅县民众抗敌后援会”（简称“民抗会”，前身是官办的梅县抗敌后援会，成立于 1937 年 9 月，是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机构。该会由梅县国民政府县长梁翰昭任主任委员，实际没有开展工作。）这个公开合法的抗日救亡领导机构，开展全县抗日救亡运动。中共梅县中心县委便指派梅县留日同学会中的共产党员张迦陵与刘渠、谢健弘、郑天任等进入抗敌后援会，实际掌握领导权。张迦陵等以留日同学会名义，劝说县长梁翰昭、国民党县党部特派员钟啸青，争取他们同意，改组抗敌后援会，将北平、上海、广州各大学回梅同学的组织和已有的学抗会、青抗会、妇女会等民众爱国团体联合起来，改称为“梅县民众抗敌后援会”。因当时“留日同学会”的声望较高，张迦陵等 4 人都被推选到领导岗位：张迦陵为秘书，刘渠为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天任为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健弘为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郑超寰、谢镇军为组织委员会委员。梅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⁶。

“梅县民抗会”成立后，对县属民主人士进行了大量团结协商工作，发动并主持了一系列宣传训练等繁重工作：一、发动县属各中学师生下乡宣传；二、直接用县民抗会名义出版《抗日旬刊》；三、组织各种培训工作。其中：①在县民抗会内，张迦陵与刘渠主持了以各校进步学生骨干为主的寒假读书会。；② 1938 年暑假，开展了两项民主抗日救亡骨干的培训工作：一是培训中学骨干，由学抗会主持，地点在东山中学，张迦陵和刘渠参加部分工作；二是培训小学教师。开学仪式由谢健弘主持，刘渠、张迦陵、叶家烈、梁芦长、谢轩宏等分别讲述“中国现代革命史”、“抗救建国纲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抗战形势分析”等学员们关心的课题。这批教师中不少人成为解放战争中的领导骨干。四、协助加强“青抗会”、“学抗会”的领导，加强并推动各区、乡、镇成立民抗分会，发动成立工会。

1939 年秋，梅县国民党政府推出“动员委员会”，禁止群众的抗日活动。“县民抗会”停止活动后，刘渠、张迦陵、郑天任先后离开梅县到外地继续接受党的任务⁷。又，10 月，《梅县民报》原任社长刘渠、副社长郑天任调离梅县⁸。依此推测，张迦陵离开梅县的时间大致在 1939 年 10 月。

1941 至 1942 年，张迦陵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任教。

1941 年 7 月至 11 月，张迦陵参加农林部垦务总局组织的荒地调查，撰写《贵州威宁、毕节、铜仁荒地区域调查报告》。民国三十年（1941 年）二月中，农林部垦务总局成立，拟定荒地调查实施大纲，决定派员分赴全国各地调查，以期明了全国各荒区分布。同年五月，即组织西北与西南两调查团，分赴甘肃、宁夏、贵州、及广西、广东五省调查，计甘肃二组，宁、黔、桂、粤各一组，共六组。参加人员，除本局职员外，并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张迦陵先生，参加西南调查一组，调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梅县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1995.08. 第 42 页。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梅县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1995.08. 第 41—45 页。
3. 中共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党史县志办公室编《融水苗族自治县党史资料丛书 3 融江抗日烽火》. 第 214 页。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梅县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1995.08. 第 45 页。
5. 闽粤赣边区党史编审领导小组著；林天乙主编《中共闽粤赣边区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06. 第 359 页。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梅县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1995.08. 第 42 页。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梅县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1995.08. 第 41—45 页。
8. 梅州日报社报刊志编纂委员会编《梅州报刊志 1906—2002》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04. 第 150 页。

查贵州荒地。张迦陵于卅年(1941年)七月七日由渝(重庆)起程,同月十一日抵筑(贵阳),计历时五月,于卅年十一月中旬返局¹。

1942年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任教²。

1945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借用四川(重庆)璧山县立中等学校为临时校址,初成立时设有社会教育行政、社会事业行政等学系。社会事业行政学系朱约庵、朱亦松、许德珩、刘及辰等先后任系主任,教师有张迦陵和张少微、言心哲、陈仁炳、岑家梧、丁璜、陈文庵等³。1945年下半年,张迦陵任教本系必修课《合作事业》。1946年上半年,教本系必修课《社会保险》,1947年上半年,教选修课《农村经济》,1948年上半年,指导该系学生彭时平撰写毕业论文《实施社会保险之基本问题》⁴。

1946年,张迦陵在重庆参加九三学社成立大会。1946年5月4日,在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张迦陵同卢于道、王卓然、黄国璋、张雪岩、吴藻溪等发表自由演说,一致指出:武力不能求得统一,东北及中原的内战必须立即无条件停止,1946年,张迦陵在重庆参加九三学社成立大会。1946年5月4日,在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张迦陵同卢于道、王卓然、黄国璋、张雪岩、吴藻溪等发表自由演说,一致指出:武力不能求得统一,东北及中原的内战必须立即无条件停止,在政府根据政协决议改组以前,美国不应有援助中国的任何党派之行为,希望马歇尔元帅继续以公正态度,调处国共纠纷,实现全中国的和平民主。会上张迦陵当选为理事。

按:1946年9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搬迁结束,新生部设栖霞山新校址,其余各年级,在苏州拙政临时

校址上课⁵。说明,1946年上半年,张迦陵在四川重庆,当时教二年级学生彭时平。因1947年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苏州)任教,以及1947年,张迦陵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⁶,推测张迦陵很有可能在下半年随校迁至苏州。

1948年,在东吴大学文学院经济系、社会系任教⁷。期间,受河南大学(1948年7、8月-1949年6月河南大学在苏州)法学院聘请,作为兼职教授⁸。

1948年8月25日下午6时半至11时,张迦陵参加九三学社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办的讨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活动⁹。

1950年:在北京合作局合作干部学校工作,时任九三学社总社宣传委员会委员。作为代表参加九三学社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¹⁰。

解放初于北京逝世¹¹。

(本文作者为社秦皇岛市委宣传部长)

1. 张迦陵等编《贵州威宁、毕节、铜仁荒地调查报告》农林部垦务总局,1942.05.序及第1页。
2. 彭星霖著《高等学校与社会变迁——从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2008.04.15.第15页。
3.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 文化艺术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01.第526-527页。
4. 苏州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校友会合编《峥嵘岁月 第3集》1991.10.第91-95页。
5. 苏州大学社会教育学院武汉校友会编《峥嵘岁月 第1集》.苏州大学社会教育学院武汉校友会.1987.第1页。
6. 孙本文著《孙本文文集 第3卷 近代社会学发展史 当代中国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05.第392页。
7. 王国平等编《东吴大学史料选辑 历程》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04.第313页。
8. 河南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河南大学校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第211页。
9. 罗广武编著《中国民主党派大事通览 1949-2000 上》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05.第50页。
10.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办公室编《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11.第116页。
11. 《梅县市党史资料》1984,第14期,第36页。

浅析建国前储安平政治转向的原因及程度

於亮

本文对建国前储安平从对国共均有批评，信奉“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立场”转变为接受并拥护共产党的原因及转向的程度做初浅探讨，以抛砖引玉，求教方家。更希望以此问题为突破口，深入剖析，对储安平的思想属性进行全面而精准的定位，对他建国前后的思想状态进行全面和真实的反映。

一、储安平政治转向的原因

（一）对国民党当局的态度由抱有幻想到彻底绝望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先后在重庆和上海创办《客观》和《观察》两份周刊，标榜自由主义的立场和精神。特别是在主办《观察》期间，储安平强调“思想的出发较之思想的归宿更为重要”¹，甚至放言“只要你敢写，我就敢发”。他不仅亲自捉刀，撰写政论文章，也向各界名流就评论国家政治生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约稿。《观察》刊登了大量批评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维护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同情学生运动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一时间出现了《观察》“洛阳纸贵”，读者上百万的盛况。可以说，主办《观察》时期是储安平一生事业的巅峰期，也是他政治转向的关键期，通读这一时期他发表在《观察》上的文章，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他思想的变化轨迹：对国民党政权的抱有幻想到彻底绝望。

以1947年3月储安平发表在《观察》上的《中国的政局》为分水岭，之前他虽然也抨击国民党政府，但主要是建设性的批评。如他在《失败的统治》中，批评国民党20年统治的结果是“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

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分析原因是“国民党只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取得的政权，而于国家本身却一无建设。”所以他“警告国民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²即便在《中国的政局》中，储安平认为国民党的大局无望了，还是开出了药方，“改组政府，尽不必拉那些不相干凑数的人，国民党里面未尝没有优秀开明的自由进步分子，给他们权力，给他们机会，接受他们的观点，接受他们的作风，全国耳目，也会一新”。³从《中国的政局》之后，储安平文章中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力度越来越大，火药味越来越浓，如他在《一场烂污》中，抨击国民党执政“70天是一场小烂污，20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20年来拆足烂污！”⁴《政治失常》更是在结尾处哀叹，“处此危局，几乎无政可议，无政足论，仰望长空，废笔三叹！”⁵对国民党政府的彻底失望之情表露无遗。

在储安平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起变化的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对储安平和《观察》的态度也悄然发生变化，在国民党政府的心目中，《观察》从原来的“硬性高级的刊物”变为“言论偏激，歪曲事实，为匪张目”⁶的刊物。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国民党政府查封《观察》，逮捕《观察》工作人员并通缉储安平，酿成了当时震惊中外的《观察》事件。因为储安平早有准备，逃到北平才得以幸免⁷。国民党政府对过错的我行我素，不思悔改，反而倒行逆施，加害提出批评的人，可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促使储安平对这个曾经抱有幻想的政权彻底绝望。

（二）左翼知识分子朋友的影响

1.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储安平文集》下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50页

2. 《失败的统治》，《储安平文集》下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37页

3. 同上，第241页

4. 同上，第275页

5. 同上，第281页

6. 转引自，赵一顺：“论储安平之投奔解放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0卷），第263页

7. 同上，第265页

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的加剧和迫害是储安平政治转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客观原因,这是一个大环境。但不可否认,造成他的转向还有小环境,即他身边的左翼知识分子朋友的影响。

此时的储安平生活在上海,是《观察》周刊的主编,复旦大学教授,中英文化协会的副会长,其社会交往基本围绕办报、教学学术和协会工作展开,社交圈子也较为稳定。

在《观察》周刊的编辑、出版事务上,储安平与作为《观察》股东、发起人、撰稿人的笄移今往来颇为密切。笄移今公开的身份是著名经济学家,民治新专教授,九三学社理事,民建会员,“大教联”¹会员,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银行经济研究室研究员,但他的背景则不同寻常。笄移今曾于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之时,根据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指示,被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派遣到江西赣州,按党的指示,负有特殊使命在蒋经国身边工作。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与黄道同志单线联系,后因黄道同志不幸逝世,笄移今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²。虽然后来笄移今的中共党员身份未能恢复,但他思想左倾则是不争的事实。笄移今与储安平同为江苏同乡,二人在重庆时相识,交往很是相得。笄移今回忆说:“储同我常在一起分析政治形势,讨论编务和选稿标准等问题”,尤其是“在收到有关经济政治方面的来稿而又难于取舍时总送我审阅决定”³。

笄移今这位《观察》最大的股东带有左翼色彩,而且位列《观察》的第二、三号股东的林元和徐盈,也是思想左倾、支持中共的人士。因为为《观察》约稿,储安平也结识了一大批思想左倾的进步学者和人士。就连《观察》被封后,国民党特务在北平搜捕储安平时,他也是得到许德珩、楼邦彦、钱端升等左翼教授的掩护和帮助才得以顺利逃脱⁴。

储安平在复旦任教也并非偶然,归功于在重庆时期

结识的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前辈学者的推荐。储安平先是接受张志让邀请任教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后又应陈望道邀请在新闻系授课。张志让是复旦大学老教授、法学院院长,“大教联”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曾参与创办民建,与上海各界都有着稳定而通常的联络渠道,是民主界的领袖。陈望道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者、最早的共产党党员,尽管后来脱党,但一直以学者的面貌从事革命宣传和民主运动。周谷城曾和毛泽东一起工作,与共产党渊源颇深⁵。这三位学者中,特别是张志让与储安平交往较深,受其影响较大。据中共地下工作者李正文回忆,1948年张志让“在他的所有朋友中广泛地进行了起义的宣传工作。……据我今天还能记得起来的,就是志让同志对我多次谈过关于常常分别找钱昌照、赵君迈、储安平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共同研究、讨论如何推动各自周围的朋友,拒绝跟着蒋介石撤退台湾”⁶。1948年12月《观察》被国民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形势岌岌可危之时,储安平在逃往北平前将《观察》周刊托付给张志让照料,可见储安平对张志让的信任和两人的友情之深。

储安平与一同共事于中英文化协会,任秘书长的陈维稷来往也较为频繁。陈维稷当时是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中纺第一印染厂厂长,民建会员,“大教联”会员,实际身份为中共特别党员,受中共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委派专门从事工商界的统战工作。陈维稷是留英学界的前辈,对储安平多有照顾,也很看重储安平的才华。在陈维稷的主持下,中英文化协会经常以座谈会的方式开展活动,也邀请一些进步人士举行秘密会议,一般都邀请储安平参加。

从储安平的朋友圈子可以看出,他所来往的知识分子朋友大多与中共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尽管储安平为了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刻意与这些民主人士保持距离,但他已置身于这样一个带有明显左翼色彩的社会关系网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三件事中可见一

1. “大教联”,全称为“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是上海市各大高校进步教授联合而成的一个民间团体。

2. 苏怀一:“笄移今与党合作共事的若干事迹”,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网站

3. 转引自,郑志峰 冶芸:“也谈储安平的政治转向——基于社会交往网络视角的考察”,《党政教学》,2012(7),第78页

4. 转引自,赵一顺:“论储安平之投奔解放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0卷),第273页

5. 转引自,郑志峰 冶芸:“也谈储安平的政治转向——基于社会交往网络视角的考察”,《党政教学》,2012(7),第79页

6. 转引自,郑志峰 冶芸:“也谈储安平的政治转向——基于社会交往网络视角的考察”,《党政教学》,2012(7),第79页

斑。一是接受施复亮的建议,《观察》不再刊登言和平的文章。1948年10月,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发表在《观察》周刊上,当时国共双方的军事态势发生180度变化,共产党的军队节节胜利,国民党的军队则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这篇文章刊出之后,引起了中共对《观察》的不满和批判,在中共的委托下,施复亮决定请笄移今作为中间人,约请储安平面谈。施复亮早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后退党以学者身份从事革命民主运动,战后加入民建。据笄移今回忆,储安平平静地听完施复亮的意见,什么都没有说,只在下一期的头条,登了施复亮的一篇从经济管理方面抨击当局的文章,并把施复亮应约为《观察》撰稿人,多次刊登施复亮有针对性的政论,《观察》从此也没有刊登呼吁和平的文章¹。虽然储安平听取施复亮意见之时未作表态,但他用行动表示对施复亮建议的默认。二是储安平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主动加强了同上海社会各界的联系,如以“观察社”的名义邀请进步人士座谈,互通消息,商讨对策,又和冯宾符、叶圣陶、郑振铎等新闻界人士联系起来,每星期六晚上轮流做东,秘密聚餐座谈²。三是他也开始参与一些公共的社会活动,如在“九三学社”发表的联合宣言《对美国积极助日复兴的抗议》上签名,接受学生邀请出席1948年6月2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体育馆举办的“反美扶日公断会”等³。

(三) 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自身局限

从本质上说,以储安平为代表的信奉“第三方道路”的人大多是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固然,他们有很高的知识修养,有现代的思想和视野格局,有很好的道德操守,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誉和号召力。但他们恰恰缺少乱世中政治斗争的杀手锏,既没有严密的政治组织,也没有武装。而这恰恰正是我们这样一个几千年信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缺少妥协氛围的国度里,在政治斗争中最为致命的缺陷。所以他们只能依靠掌握或有能力掌握统治权的政治集团,才能实现自己政治改良的理想。事实也是如此,随着1947年1月国民党政

府对第三方的主要政治代表民盟以非法名义要求解散,民盟转入地下活动开始,相当一批民主人士选择了和中共联合或是表示出好感,储安平也不例外。从《中国的政局》之后,储安平已无公开的言论来批评或谈论中共,开始为中共说话。他在1948年5月发表在《观察》上的《第二个闻一多事件千万制造不得》中写道,“不仅一般青年学生越来越趋极端,就是一般中年人,据我们所了解的,心情和思想也都一天一天的在转向变化:本来对于政府感觉失望的,慢慢儿的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对于政府感觉绝望的,终于对于政府“不望”(不再存什么希望)了;本来无所谓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的左倾了;本来稍稍左倾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的左得厉害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也在努力了解共产党了;本来不大喜欢共产党的,现在也渐渐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了。”

(四) 民族主义者的本性使然

笔者认为,上述的三个原因都不是根本,真正使储安平政治转向的根源是他的民族主义信仰,否则,他完全可以逍遥海外,继续保持超然的政治姿态,之所以留下来就因为他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至上者。这里存在一个争议,笔者予以解释。一直以来,很多研究者都把储安平定位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由主要有二个。一是1928年储安平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学习,胡适、徐志摩、张东荪、罗隆基、潘光旦、廖世承、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彭文应等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自由主义者均在光华大学任教,而且罗隆基、王造时等教授就执教于储安平所在的政治系⁴。储安平受到了这些老师自由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二是主办《观察》周刊时,储安平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办刊立场,公开宣称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批判政府,抨击当道。《观察》周刊成为当时自由主义运动的一面大旗,有学者赞誉“它把中国广大的自由知识分子充分地调动和集结起来,更把近百年来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思想的高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⁵

1. 引自,郑志峰 冶芸:“也谈储安平的政治转向——基于社会交往网络视角的考察”,《党政教学》,2012(7),第79页

2. 同上,第79页

3. 同上,第79页

4. 王素雪:“感伤、忧郁、幻灭——储安平早期文学创作及思想倾向”,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2页

5. 邓利平:“储安平后期思想变化及活动诂议”,《国际新闻界》,2009(11),第116页

把储安平定位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上述两个理由站不住脚,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极其复杂甚至前后矛盾,也是不断变化的,不能仅仅根据某个时期的言行表现来概括其一生,要总览其一生的言行表现。而且学生受到老师思想的影响一般实属必然,但如果根据老师的思想就判断学生从属于哪个思想阵营则是武断。

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自由主义者坚持个人自由、人权和民主等普世价值不容侵犯,强调人首先是个体,其次才属于国家或民族;而民族主义者则认为,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不存在任何抽象的人,每个人都是具体文化环境的产物。

总览储安平的一生,他主要是一位报人,翻阅储安平从青年到建国前写的发表在报纸上的政论、评论文,其中大部分的文章都是鼓吹民族主义。尤其发表于抗战时期的一些文章甚至宣扬,相对于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强盛,个人的自由和生命都无足轻重,带有明显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他于1929年发表了《双十节在我们的心头》,在文中,他向国人疾呼不要只沉浸在享受假期的快乐中,更要重视纪念日的意义,不能忘记五卅、五三惨剧是帝国主义的压迫造成的,要集合全国之力,与东西方这些横暴的列强誓死抗争。又如储安平于1932年发表的《现在的问题》,文中抨击国民党的失败是丧失道德的缘故,更给出了国人要“心与口”和“手与足”并用的解决方案。1933年他担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到1936年去英国留学前的这一期间,发表了不少拥护国民政府、呼吁结束内战、国家统一、歌颂新生活运动的文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储安平作为《中央日报》特派记者赴德国采访奥运会,发表了《德国解放了我们中国如何》、《半盲的太太说要看元首》、《柏林的拥挤和日耳曼精神》¹等新闻报道,盛赞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德国摆脱了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重新恢复世界强国的面貌,也盛赞德国人民对领袖希特勒的崇敬和忠诚。并呼吁国人要以德为师,实现中华民族的强盛。无论储安平当时是否知晓纳粹党专制和残暴的真实情况,但对权威的迷恋和推崇,怎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所作所为?

卢沟桥事变后,储安平发表《金汤一般的武汉》、《我们欢迎战事延长》、《强国的开端》、《论抗战之影响》等文章,讴歌英勇抗战的将士和民众,更宣扬,对外战争常是促使一个国家从散漫到统一,从衰弱到富强的必经阶段,抗战正是通过血与火的洗礼,从精神和物质上焕发我们民族浑厚的潜力,实现强国的重要契机和开端。也是从这一角度,储安平做出了近似疯狂的希望战事延长的期望。

1938年结束英国留学生涯回国的储安平,把在留学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撰写成《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比较研究》、《英国与印度》、《英国采风录》等专著。通读这些专著,透过字里行间,能强烈感受到他审视英国政治体制,总结英国政治经验背后的落脚点还是来反省中国的政治发展,如他在《英国采风录》自序中这样写道:“他(作者)之常常不能自己地将他所属的国家和他所叙述的国家作种种的比较,殆亦人情之常。他常思及两项问题:第一、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他们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无相同相似之处?第二、多年以来,英国为一强国而中国为一弱国,一强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²

即便储安平主办《观察》周刊时,虽然也呼吁自由和民主,但却认为自由和民主的终极目的是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正如他说创办《观察》周刊的目的不仅为“自由思想分子”提供一个言论政治的平台,更要培植自由主义的风气,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在失序的社会中形成一股安定的势力³。他发表在《观察》周刊的文章中,相对于“自由”,出现频率更多的是“国家”和“国运”。由此可见,他办刊的目的是要揭露政府阴暗面促其改正,重建稳定秩序,实现国家元气的恢复乃至步入正轨。也是为了国家着想,当看清国民党政府这个“扶不起的阿斗”的真实面目,他主动予以抛弃。

储安平正是受到强烈民族主义情怀的驱使,在当时合法政府四处捉拿通缉他时,他没有选择逃亡海外,继续保持自己超然独立的政治姿态,而是逃到了他并不了解的解放区,原因很简单,他舍不得离开祖国,他还要为祖国效力!而且在解放区,储安平也看到了一个不同

1. 《强国的开端》,群言出版社,2015年版,第483—485页

2. 王大飞:“储安平和他的《英国采风录》”,《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4),第127页

3. 郑志峰 冶芸:“也谈储安平的政治转向——基于社会交往网络视角的考察”,《党政教学》,2012(7),第78页

于国民党的新天地，解放军的纪律严明，中共同志的刻苦耐劳，解放区百姓的满足和活力，到处响起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的嘹亮歌声。很快，中共领导的革命结束了国家的内乱迎来和平统一的喜人局面。中共也对往昔屡屡遭到国民党打压的储安平给予较高的礼遇，邀请他参加新政协，周恩来等领导人专程拜望并相谈甚欢¹。目睹此景此情，立志于实现国家民族强盛的储安平怎会无动于衷，他感慨地说：“解放以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都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中国有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恩列斯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使一切在怀疑中的、苦闷中的、彷徨中的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正确的道路。”²也难怪其子储望华曾回忆：“令我难忘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白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有幸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上观光检阅，晚上带我们全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狂欢。建国之夜，我是骑在爸爸的双肩上，在天安门前度过这难忘的一宵。爸爸在建国日当天当夜所表现出来的兴奋、激情，至少在于我们这个孩子，是一生中所从未见到的一次。”³这正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夙愿实现后情不自己的真实写照！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是促使储安平政治转向的根源。否则作为一个年近四十、思想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他怎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全放弃对中共的原先看法，进而接受并拥护中共呢？这与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的选择截然不同。当然后来两人的命运也不同。储安平的政治转向既是其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本性使然和必然选择，也是否定其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明证。

二、政治转向的程度

政治转向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此时的储安平政治转向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是彻底脱胎换骨，完全接受了中共的主张？还只是部分接受了中共的主张？笔者

认为储安平只是接受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有三个证据。一是储安平分别于1949年和1951年先后加入了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两个民主党派，如果他完全赞同中共的主张，怎不加入中共，就算中共未必接受，他也完全可以提出申请，但他并未这样做。二是他在1957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党天下”的言论，通篇多处提到接受中共的领导，但主要质疑之处聚焦于“在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这番话表明，储安平虽接受中共领导，可还是把自己放在党外人士参与联合政府的定位上，显示出和中共的距离。而且可以看出，他极力要求恢复新中国刚成立时联合政府的形式。而这个联合政府的形式，恰恰就是中共中央在著名的“五一口号”中提出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并主张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三是建国后储安平发表的一些文章表露出的政治态度。他在撰写了《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的文章中热烈地欢呼，“组成这样大阵容的中央政府的主要政治基础就是由各革命阶层各革命党派构成的统一战线”，相信中央政府“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使我们国家早日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境界。”他在1949年11月庆祝《观察》复刊的开篇文章《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中热情地表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克勤克俭、务老务实地从事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本社同人，将在这样一个新的认识下，站在文化岗位，按

1. 邓利平：“储安平后期思想变化及活动论议”，《国际新闻界》，2009（11），第117页

2. 《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储安平文集》下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81页

3. 转引自韩成《我本将心向明月——储安平的迎合与失落》，载《南方都市报》2014年08月19日B17版

照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民主事业尽力。”由此可见,储安平完全接受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即在中共的领导下,团结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

后记

笔者虽反对将储安平定性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不否认他作为民族主义者兼具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气质。而且观察储安平一生的思想追求,民族主义第一,自由主义其次,但不同时期的表现程度不同。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他的民族主义立场表现的愈鲜明,甚至带有反自由主义的倾向。国家命运趋向好转之时,他又高唱自由和民主,以超然、中立、公平和理性的立场发声,俨然自由主义的代表。虽然这一自由主义表象的背后蕴含着他希望以西方自由民主之风重振国运的苦心,但往往使人迷惑。如果说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价值对立的矛盾,这在近代中国表现的尤为突出,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和自由启蒙的两大问题面前,迫于外患的现实压力,很多知识分子都选择了救亡第一,毕竟大谈民主和自由,不讲纪律,形成不了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没

有流血牺牲,是无法战胜外患,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独立的,这毋庸置疑。从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来看,救亡图存和自由启蒙的两大问题上,救亡占了上风。储安平未能跳出这个圈子,但他作为民族主义者兼具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气质使他难能可贵地表现出超出一般人的清醒和远见,一旦条件允许,他又担起自由启蒙的重担。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要他忠实地践行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而自由主义气质又让他超然于政治之外,屡屡说不合时宜的话,哪怕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执政者好,哪怕他的态度无比真诚,结果还是导致了他的悲剧。正如同与储安平在抗战时期一起办过报纸的冯英子对他的评价“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¹

(本文作者为社中央研究室社史研究处副处级调研员)

一部组织政策文件的存废历程

但 勇

2005年5月22日,九三学社第十一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加强组织建设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2005年版《若干规定》”)。这是一部综合性组织政策文件,直到今天仍在用。笔者试图回顾18年间,制定这部文件的来龙去脉和对它不断修订、补充的情况,分析、预测它的终极归宿。

这部文件的前身是1999年6月出台的《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加强组织建设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1999年版《若干规定(试行)》”)。出台的背景和依据有三个:一是1996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形成,二是1997年11月九三学社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九三学社章程》进行修改,三是九三学社加强组织建设的迫切需要。试行文件包括领导班子建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组织发展、社员管理、地方组织工作规则等六个部分。

2002年12月九三学社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九三学社章程》再次进行修改后,社中央提出实施人才强社战略的口号。2004年12月4日,九三学社第十一届

1. 转引自,储望华 李菁:“秋之泣—怀念父亲储安平”,《文史博览》,2008(12),第10页

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实施人才强社战略的意见》。同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组织发展若干问题新的座谈会纪要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试行文件废止，正式文件《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加强组织建设的若干规定》于2005年诞生。

2005年版《若干规定》与1999年版《若干规定（试行）》相比，主要存在三处显著差异。首先，在原先六个部分基础上增加一个部分即组织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目的是为保证人才强社战略的实施、为我社履行参政职能和自身建设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其次，对组织发展部分做出较大修改。再次，社员管理部分增加“社内重点人物管理”的规定。下面重点介绍一下对组织发展部分的修改内容。

组织发展对象主要是从事科学技术以及高等教育、医药卫生工作等方面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了参政议政工作的需要，在坚持重点分工的前提下，可适当发展一些从事文化、财经、政法等工作及政府部门有较强代表性的优秀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士一般掌握在发展总数的30%以内。（1999年版《若干规定（试行）》）

组织发展对象。以从事科学技术以及高等教育、医药卫生工作等方面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在坚持组织发展重点分工的前提下，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发展从事经济、管理、法律、文化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工作及政府部门、新的社会阶层中有较强代表性的优秀知识分子入社，这部分人士一般掌握在发展总数的30%以内。

（2005年版《若干规定》）

两相比较，2005年版增加了“适当发展新社会阶层中有较强代表性的优秀知识分子”。

1999年版《若干规定（试行）》关于组织发展工作的几个政策性问题如下：

1. 不在军队、公安、安全、外交系统、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中国共产党机关（包括党报）发展社员，一般不在法院、检察院发展社员。已在上述单位工作的社员保留社籍，但不在单位开展组织活动。

2. 不在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在校学生中发展社员。

3. 一般不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社员。

（1）在文艺团体中从事戏剧、影视、歌舞等表演艺术及舞台美术、音乐演奏等工作人员；

（2）体育队中的教练员、运动员及其他工作人员；

（3）中、小学及技校的教师和职员。

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中学特级教师及文化艺术、体育界知名人士，根据需要可个别发展。

4. 在大、中城市的军转民企业中，对我社有一定历史联系、开展统战工作特殊需要的人士，可个别发展，但不建立组织。

5. 一般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在有中共组织的私营企业、合资企业中从事经营管理和技术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确有需要、政治素质好、有一定代表性的，可个别发展。

6. 在新疆、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城市发展社员，建立组织；不在西藏发展社员。

7. 不在境外发展社员。根据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可适当发展回大陆定居的拥护祖国统一、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爱国者。8. 对已经离退休的知识分子原则上不再发展。确属在政治、学术上有较大影响和具有较高参政议政能力并能正常参加组织生活的，可个别发展。

9. 社的机关干部入社，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经过考察在政治思想上符合入社条件，可根据工作需要发展入社。

2005年版《若干规定》关于组织发展工作的几项政策性规定如下：

1. 不在军队、公安、安全、外交和中国共产党机关（包括党报）发展社员。已在上述单位工作的社员保留社籍，但不在单位开展组织活动。

2. 不在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在校学生，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宗教教职人员中发展社员。

3. 一般不在中、小学及中专、技校发展社员。

4. 少量发展新社会阶层人士中与九三学社重点发展范围相关的代表性人士。发展新社会阶层人士，除必须具备政治素质、道德品质、知识层次和代表性方面的条件外，还要求已作一定政治安排或担任一定社会职务，并征得省级组织同意。个别发展私营企业主中与九三学社重点发展范围相关的代表性人士，发展私营企业主，还应具备以下条件：诚实守信，合法经营，遵纪守法，热爱公益事业，在同行业中影响好、代表性强。

发展前,应与其所在地中共党委统战部门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并向工商、税务等部门了解其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情况。

5. 在新疆、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城市发展社员,建立组织;不在西藏发展社员。

6. 不在境外发展社员。根据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可适当发展回大陆定居的拥护祖国统一、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爱国者。

7. 对已经离退休的知识分子原则上不再发展。确属在政治、学术上有较大影响和具有较高参政议政能力并能正常参加组织生活的,可个别发展。

8. 社的机关干部入社,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经过考察培养,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知识能力、工作业绩上符合入社条件,可根据工作需要发展入社。

两相比较,发生以下明显变化:

2005年版取消不在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展社员,一般不在法院、检察院发展社员,一般不发展文艺界、体育界人士等政策限制;“一般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可个别发展有中共组织的私营企业、合资企业中从事经营管理和技术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改为“少量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与九三学社重点发展范围相关的代表性人士”;发展社的机关干部入社,不仅要在政治上符合入社条件,还要在道德品质、知识能力、工作业绩上符合入社条件;增加不在宗教教职人员中发展社员的规定。因时过境迁,“在大、中城市的军转民企业中,对我社有一定历史联系、开展统战工作特殊需要的人士,可个别发展,但不建立组织”这一条予以删除。

2007年7月12日,九三学社第十一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加强地方组织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2010年5月11日,九三学社中央第十二届第十四次主席会议通过《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地方组织建立健全领导班子谈心会制度的意见》。这两份文件一出台,《若干规定》中领导班子建设部分即不再试用。

2007年12月九三学社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社章再次修改,组织发展政策相应做出调整。2009年6月23日,九三学社中央第十二届第十七次主席办公会议通过《九三学社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组织发展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文件包含四个部分:一、关于发展新的

社会阶层代表性人士,二、关于制定新建省辖市级组织计划,三、关于新建县级组织,四、关于保持特色。文件末尾提到:“本意见执行中,遇有与1996年以来关于组织发展工作文件精神不一致的,以此意见为准。”此文件等于是对《若干规定》中组织发展部分进行修正。2008年10月16日,九三学社第十二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加强省级组织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2014年3月6日,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做好2014-2017年省级组织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替换了2008年制定的文件。这两份文件先后出台,意味着《若干规定》中后备干部队伍建设部分不再试用。

2010年5月15日,九三学社第十二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使得《若干规定》中基层组织建设部分不再试用。

2012年12月,九三学社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把我社建设成为思想上坚定、履职上坚实、组织上坚强的参政党,并对社章再次修改。2013年5月7日,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九三学社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推出许多创新举措。其中涉及组织发展的新政策重点有如下两段表述,等于是对《若干规定》中组织发展部分进一步充实完善。

着力做好代表人士的发展工作。着力吸纳两院院士、国家特聘专家、长江学者、省(部)级以上重点学科带头人、重大奖项和荣誉称号获得者,以及已形成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专家学者。重点吸纳国家各类高层次人才计划项目入选者及国家和省(部)属重点实验室骨干。积极吸纳科学研究领域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人才。重视吸纳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财税、金融等专业人才。重视吸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文化传媒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管理人才。重视吸纳科技型企业和新社会组织的高层次人才,把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等作为发展社员的一个新的重点区域。

合力推进组织发展工作。各级领导成员要把吸纳代表人士放在重要位置,带头物色、推荐和发展。中央院

士工作委员会及其成员应把发展代表人士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以及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社组织应主动承担重点人物的发展任务。各级组织要切实抓好组织发展工作，把推荐和发展优秀人才入社作为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考核内容。各级组织部门和基层组织要主动接触联系社外代表人士，畅通申请、考察和吸纳途径。在当地发展个别优秀人才遇到困难的，由上级组织给以协调和帮助。

《若干规定》中社员管理部分有“社费收缴”一项。经2016年调研，社中央认为社费收缴政策应与时俱进做出重大调整，有必要酝酿出台独立文件。

2017年12月，九三学社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

次修改社章，随后将会形成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组织发展若干问题新的座谈会纪要，于是《若干规定》中组织发展部分还要推陈出新。

如此一来，《若干规定》这部综合性组织政策文件在分离出领导班子建设两个独立文件，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社费收缴等各一个独立文件之后，组织发展、社员管理、地方组织工作规则等三个部分也可以各自变成单行文件，《若干规定》似乎没有存在价值了。展望这部文件的前景，最终很可能一分为八，完成使命，光荣退役。

（本文作者为社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处长）

亲和敦睦的税氏家风

郭 祥

税西恒（1889—1980）四川泸县人，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九三学社的重要创始人、杰出的水电工程专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努力实践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积极参与民主革命和国家建设，是一个不畏权、不怕苦、不惧死的铁打硬汉，于家庭则精心呵护，以言以行对子孙晚辈教导有方。

1928年，39岁的税西恒与知书达理、秀毓贤惠、江苏崇明师范学校毕业的小学教员方淑芬结为连理。1932年，女儿税鸿先出生。方淑芬由于生产时发生血崩，此后再无生育。按中国旧传统，没有男丁承继门第是一件大事。有朋友劝说税西恒纳妾，家族内也有劝他过继侄孙的。留学德国、经历开明西学熏陶的税西恒非常坦然：无子何妨，女儿一样可以成就大业。

据税鸿先回忆：父亲对她十分疼爱，从来没有高声厉言，但也从不娇生惯养。无论为人处事或学习、工作，他都严格要求，从各方面对她正面引导。他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慈父，又是她的良师益友。

1938年，税鸿先6岁。为躲避日寇对重庆无差别野蛮空袭，税西恒将妻女送回四川泸县济和电厂（由他设计建造并持股）职工宿舍暂住。这是税鸿先第一次离开大城市。电厂地处穷乡僻壤，厂里工人师傅和周围农民生活都很贫困。为了让她与穷人家的孩子打成一片，

税西恒要求她穿补丁衣、着稻草鞋，与其他孩子发生纠纷，先检讨自己，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允许有任何城市小姐的骄横之气。在电厂3年多，税氏母女与当地地人相处非常融洽。

税西恒非常注重培养税鸿先独立生活的能力，要求她学会自立自强、低调做人。14岁时，她被送到重庆南开中学住读，生活完全自理。1950年，她高中毕业，在父亲的鼓励下，勇敢地离开家、远离重庆，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从北大分出，改名为北京医学院）。在北京，因父辈关系，她是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家里的常客，与许鹿希（后为邓稼先夫人）情同姐妹。

1954年，税鸿先临近毕业，曾就毕业去向征求父亲的意见。税西恒要求她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以事业为重，服从组织分配，尤其不能以照顾家庭为名义影响事业。其后，税鸿先被无干预地分配到石家庄华北制药厂。1966年，为支援三线建设，她调到西安药厂。

70年代初，父亲年过八旬、母亲身体不好，为尽孝心，税鸿先向组织提出调回重庆。她是药厂技术骨干。为了让她安心工作，厂领导专门派人到重庆做税老工作，提出让老两口迁居西安，承诺解决户口和住房问题。重庆市有关领导知道此事后非常诧异，立即制止，表示作

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的税西恒不可能离开重庆。通过这件事,税鸿先的爱人、同事,特别是她自己才知道她父亲极不平凡,是一个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人,她自己是“高干子女”。1973年,因工作关系,她调到四川成都。

世间常有祖孙之间“隔代相亲”一说,但税家向来无“宠”,所传承的无非是谦谦君子之礼。1959年,税鸿先长子在重庆出生,经与丈夫商议,将孩子承桃给父亲为孙,取名税方,以祝贺父亲70岁寿辰。古稀之年得孙,税西恒欣喜不已,并把税方留在身边,亲自教育抚养、从来严格要求。税鸿先回忆:大约1964年,我回重庆看望父母和儿子。父亲对我说,税方几天前玩看门张师傅的扑克牌,把其中一张撕坏了,叫我买一副新的还回去。张师傅一再声明那是一副废牌,但我办了此事,父亲才安下心。又有一次,我母亲不小心把放在窗台上的老鼠药撒落到一楼(我家住二楼)。过了一些天,邻居家有一只鸡死了,父亲怀疑是误食了老鼠药,叫我母亲去赔钱,直到说服邻居接了钱,他才罢休。

由于祖父母的言传身教,税方非常优秀。1981年底,他从重庆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学美国。目前,税方在上海一家公司担任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税西恒对子侄辈也十分关心,重视加强教育,强调不仅仅是为了家族兴旺,更是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他有3个侄儿、1个侄女、1个外侄,税西恒先后把他们接到重庆接受教育,甚至侄儿们的未婚妻也由他出资进行培养教育。30年代初,正值他们步入人生成熟期,每逢星期日,税西恒都要把他们叫到家,改善生活、融洽亲情,同时对他们的人生人格施以正确引导和鼓励,特别要求他们“必须实现由传统食利地主向知识分子的转变”。3个侄儿后来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税述之后来担任重庆自来水公司工程师,参与筹建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是第一届理事。受此门风影响,侄孙辈大多勤奋好学,有的留学并定居国外。

与税西恒共过事的人,对他的印象是友善,彬彬有礼、以理服人,从不发脾气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更乐于助人。他本人生活俭朴节约,作为管理人员,在主持建设电厂、自来水公司时,穿的衣服总是打满补丁。只要是工友、亲友有难向他开口,他总是慷慨解囊相助。有一位工友找了他几十年,终于在重庆找到,并急切地提着土特产来看望他,表示“是你借钱,我才度过难关,有了今天。有借有还,今天我还了钱,死也瞑目了。”因为时间长了,税西恒早就忘了这一茬,坚决推辞。那

位工友死活不肯,直到税老收下钱物他才高高兴兴地离开。1967年,造反派抄税老的家,只搜到几千元钱,其中包括存折和他夫人的一点首饰。亲友和同事们都不敢相信,因为经他手的钱曾经成千上万,他却没有沾半文不义之财。

税家与济和电厂、重庆自来水公司员工及家属间断相处几十年,感情非常融洽。哪家婚丧嫁娶或遇到困难,税西恒夫妇知道了,都要去趁人情,或力所能及地送钱送粮。税鸿先长期在外地工作,周围的邻居也主动帮他们买菜买米,“乐此不疲”。

“文革”开始后,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到自来水厂(公司改厂)收集他的黑材料,煽动工人写大字报,揭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工人们坚决不答应:税总工程师老两口从解放前就对我们穷工人关心备至,我们受他恩惠不少。解放后对我们也很好,我们没有什么好写的,做人做事总要讲点良心嘛!在整个“文革”期间,竟没有一个人写他的大字报。造反派抄税西恒的家,周围群众帮着抢回东西,斥喝:这么好的老人你们都要抄,不怕遭雷劈。造反分子对沉着无语的税老无可奈何:群众都帮你说话,你的人缘太好了。

税西恒夫妇后来被迫搬出自来水厂,栖息重庆七星岗金汤街80号一个偏僻小间。尽管他身处逆境,却丝毫没有动摇对中共的信赖、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积极参加市政协组织的学习活动。

1980年2月,在九三学社重庆分社第六次社员大会上,税西恒要求广大社员放下恩怨,“把个人利益和祖国利益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前途和祖国前途联系在一起,作解放思想、安定团结、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的促进派。”

1980年5月下旬,92岁高龄的税西恒因患老年性肺炎住院治疗。几天后,病情加重。弥留之际的他非常清醒。他向女儿表示歉意,说自己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反而让她照顾,垫付医疗费。当听说医疗费由国家全部报销时,他更加愧疚,说自己已多年没有为国家做事,这样不好,无功不受禄,要女儿一定要想办法把钱还上。6月18日,税西恒溘然长逝。

(本文作者为社重庆市委社会服务处处长)



社史人物



王淦昌 (1907–1998)

王淦昌，1907年出生于江苏常熟，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九三学社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1998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1925年8月，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1929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留校任助教，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是我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1930年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女核物理学家L. 迈特纳 (Meitner)，1933年12月获得博士学位。1934年4月，王淦昌回到了祖国。他先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后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淦昌随着浙江大学迁到了贵州，有了比较安定的教学与研究环境，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学术论文，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1946年，王淦昌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

1947年9月，王淦昌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1月王淦昌回到祖国。1950年4月，他应钱三强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分工主持宇宙线方面的研究工作。1956年9月，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

子研究长。1960年12月王淦昌从苏联回国，1961年4月，中央决定任命王淦昌为核武器研究院研究员，不久，又被任命为副院长，负责冷试验技术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改名为王京。从此他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王淦昌隐姓埋名17年，为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研制以及地下核试验，做出了重大贡献。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86年3月3日，王淦昌与王大珩、杨家墀、陈芳允等四位科学家上书中央，对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提出建议。3月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并强调指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经过200多名专家、学者的全面论证和反复修改，1986年11月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批准，具有深远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在我国大地上破土而出。“863计划”实施后，已取得一大批重要成果，不少工作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在我国高技术发展中起了带头和核心的作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王养冲 (1907–2008)

王养冲，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浦东新区），1956年10月22日加入九三学社。王养冲是我国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方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位重要奠基人。2008年3月25日去世。

王养冲21岁时被推荐担任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私人秘书。1936年胡汉民病逝后，赴巴黎求学，旅居法国十年之久，师从哲学家瓦尔、历史学家费弗尔、社会学家拉洛等名家，研治欧洲哲学史、法国革命史以及涂尔干等人的社会学思想，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功底。1947年王养冲回国后，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西方社会学思想史教授。195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世界近现代史和西方思想史教授。王养冲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在1957年的

反右中逃过一劫,1958年的“反右补课”则未能幸免。“文革”结束后,年逾古稀的王养冲先后撰写并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研究》、《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等多部专著,耄耋之年,还主编完成了近90万言的《法国大革命史》。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罗伯斯庇尔选集》等,为法国史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刘建康 (1917—2017)

刘建康,1917年9月1日生于江苏省吴江县,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开放研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届主任,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主委,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九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2017年11月6日在武汉逝世。

1934年,刘建康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1939年,经刘承钊教授推荐,刘建康到内迁四川重庆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当伍献文的研究生,从事鱼类学研究工作。1945年秋,刘建康经设在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英国生物化学家、科技史学家)博士介绍,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7年秋获得博士学位。

1949年2月,刘建康返回祖国,到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水生生物研究所,刘建康被聘为研究员。同时,兼任苏州东吴大学教授。1954年,刘建康随水生生物研究所迁往到武汉,先后任鱼类学组组长、湖泊水库研究室主任,对淡水鱼类学进行了多方面研究。1957年,他主持进行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历时3年之久,总结出一套系统资料,填补了我国淡水鱼类生态学的空白。

1972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组织科技人员与东湖养殖场合作开展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1973年起该课题由刘建康主持。他提出调整放养

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拦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和改革捕捞技术等五项措施,东湖鱼产量连续7年平均每年以23.5%的幅度递增,1971年180吨,到1978年达到801吨。这项工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到1990年东湖鱼产量达到1240吨。这项科研成果对发展大水面养鱼起到了示范作用。



陈吉余 (1921—2017)

陈吉余,1921年9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和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2017年11月28日在上海病逝。

陈吉余1941年8月考入浙江大学历史地理系。1945年毕业。同年在该校攻读地貌学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地理学家叶良辅教授。1947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讲师。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河口海岸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

陈吉余是中国将河口海岸理论应用于工程实践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他长期从事与水利交通等工程建设有关的地学研究,开拓了以动力、沉积、地貌相结合为特色的河口海岸学科体系,对河口海岸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预测,在理论上多有创新。50年来,他坚持从事与工程建设紧密相关的地学研究工作,重视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发展了中国河口海岸学科体系,解决了国家经济建设中许多重大工程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国海岸带的开发、利用和工程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吉余积极建言献策。上世纪60年代末,他提出“解决危及崇明县城深达55米的施翘河深潭护岸工程措施的建议”;90年代,他提出将浦东国际机场建于海堤之外、潮滩之上,为国家节省了数以亿计的投资;2006年,他给市长写信,提醒市政府关注咸潮入侵问题,并主动请缨,以85岁高龄组织队伍前往长江上游和入海口进行水域、水质情况调查,为应对特罕灾情积极做准备。

消息 与 动态

黄险波荣获 2017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10月25日，何梁何利基金2017年度颁奖大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九三学社广州市常委、黄埔委员会副主委、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黄险波博士荣获科学与技术创新奖（产业创新奖）。本年度共52名科技工作者获奖，其中包含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名，科学与技术进步奖34名，科学与技术创新奖16名。

央视推出《王选：方正之士》专题片

十月底十一月初，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大家》栏目推出《王选：方正之士》专题片。其中，10月25日（周三）23:40播出《王选：方正之士（上）》，11月1日（周三）22:45将播出《王选：方正之士（下）》。

王选是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九、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作为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巨大影响力和特有的亲和力，在九三学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王选辞世后，其夫人陈堃铎教授按照他生前愿望，将全部积蓄100万元捐出，成立“北京九三王选关怀基金会”，目前已先后资助219名身患重疾、家庭困难的九三学社社员。使社员感受到九三学社大家庭的温暖，增强组织凝聚力，提升了组织动员力。

九三学社中央授予王贤才等10名同志“九三楷模”荣誉称号

11月9日，九三学社下发决定，授予（按姓氏笔画排序）王贤才、叶勇、孙承武、杨樾、陈履安、屈建军、侯先光、宣立学、程和平、游国师等10名同志“九三楷模”荣誉称号。

每年评选表彰10名“九三楷模”，是全社会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

九三楷模，要么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贡献突出；要么弘扬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在社务工作中勇挑重担；要么坚忍不拔、自强不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么关注弱势群体、热心公益事业、体现强烈社会责任感。社中央号召全社各级组织和广大社员向“九三楷模”学习。

九三学社省级组织换届画上圆满句号

11月15日，随着九三学社陕西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闭幕，30个九三学社省级组织5年一次的集中换届落下帷幕。从今年4月起，遵照社章，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九三学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陆续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顺利推进政治交接、实现新老交替。

换届后，一批政治上坚定、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代表人物进入新一届省级组织领导班子，而作为旗帜性人物的主委更是备受关注。本次换届具有如下特点：

调整幅度大。在本次换届中，领导班子规模与2012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但是主委调整幅度较大。刘忠范（北京）、李青山（山西）、孟庆海（辽宁）、潘建伟（安徽）、程林（山东）、秦顺全（湖北）、张少康（广东）、过建春（海南）、李学林（云南）、郝跃（陕西）、赵金云（甘肃）等11人首次当选主委，新老交替比例为36.7%，加上届中调整的庞达（黑龙江）、周岚（江苏）、屈谦（重庆），共有14人初次走上省级组织一把手的岗位。

学历层次高。30位省级组织主委全部具有高级职称，均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博士18名，占60%，硕士9名，占30%。还有4位具有海外留学经历。

年龄梯次较为合理。换届后，九三学社省级组织主委平均年龄55.3岁，较上届增加1.4岁。其中，“50后”7人，“60后”22人，还出现了一位“70后”，即47岁的潘建伟。

主委具有显著代表性。作为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参政党，九三学社在八个民主党派中一直保持拥有院士人数最多，本轮换届新任省级组织主委中有4位是院士，分别是刘忠范、潘建伟、秦顺全、郝跃，他们在各自领域成就卓越，彰显了九三学社科技特色。如潘建伟是量子通讯卫星“墨子号”首席科学家；刘忠范是“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万人计划”杰出人才；秦顺全是桥梁工程专家，为中国桥梁事业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郝跃是微电子技术专家，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截止今年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从事高等教育的社员占23%，科研人员占10%。本轮换届后，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担任领导职务的有12人，占省级组织主委人数的40%，其中新任主委6人。

性别结构较为合理。本轮换届后，省级组织主委中有5位是女性，占16.7%。值得一提的是，赵金云现任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是九三学社成立以来，首位担任省级组织主委的国企高管。

纵观7个多月的九三学社省级组织换届，虽紧锣密鼓，但平稳有序。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当地中共党委领导下，新一届九三学社省级组织主委一定会与领导班子成员同心协力，率领所在地方九三学社组织和广大社员，朝着建设思想上更加坚定、履职上更加坚实、组织上更加坚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目标，不断迈出坚实步伐。

九三学社中央举办第四次社史研究培训班

11月23日至24日，九三学社第四次社史研究培训班在北京举办。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邵鸿说，2017年九三学社中央继续扎实推进社史工程，稳步拓展“九三学社人物丛书”项目、“九三学社口述史”项目，制定《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工作十年规划（2018—2027）》，继续推进“社史工程”各个项目的深化与完善。要进一步加强社史研究工作，一是要加强规划，二是要加强工作机制建设，三是要抓住重点，争出精品，四是要利用好发挥好九三学社全国传统教育基地的作用，五是要搞好重大历史节点和重要人物纪念活动，充分利用网站和社刊等广泛开展社史和优良传统宣传教育。

培训班上，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作《如何做好“三农”调查》学术报告。贺雪峰长期从事农村调查，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20个余省市做农村调查。报告介绍了利用田野调查方法调查村民自治、乡镇选举、信访制度、税费改革、农地制度等方面内容。

上海、江西、湖北、海南、湖南等省级组织，以及社中央研究室有关负责人就社史编修、九三学社人物丛书、口述史工作展开了业务交流。九三学社各省级组织、副省级城市分管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共90余人参加培训。

九三学社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胜利召开

12月3日至7日，九三学社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3日上午9时许，大会在京西宾馆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会见与会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严隽琪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致贺词。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韩启德致开幕词并代表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做报告。

韩启德所做题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为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报告分为：过去五年的工作；五年工作实践的主要经验和体会；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新的历史起点再创佳绩；建设思想更加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把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建设履职更加坚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更加出彩；建设组织更加坚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增强组织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等6个部分。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丛斌代表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做《九三学社章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大会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反映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五年工作的专题片《坚实的步履》。

7日，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通过九三学社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九三学社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由236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期间举行的九三学社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由47人组成的九三学社第十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新一届九三学社中央领导班子，武维华当选主席，邵鸿、张桃林、赖明、丛斌、赵雯、卢柯、印红、黄润秋、潘建伟、刘忠范当选副主席。

武维华在闭幕讲话中指出，九三学社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中共十九大精神指引下举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新一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要继承和发扬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全社各级组织和广大社员，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助力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闭幕会上还宣读了给离任同志的致敬信。



1984年，潘菽与助手李令节研究修改《心理学简札》（征求意见稿）。



1957年，潘菽（中）率团访问民主德国。



1986年10月17日，许德珩（前排左一）在医院度过96岁生日，步入97岁。潘菽（前排右一）与中央统战部及九三学社中央其他负责人前来祝贺。

唐宋論書絕無及此碑者惟永叔集古
乃曰南朝士人氣尚卑弱率以纖勁清媚
為佳自隋以前碑誌文詞淺鄙

水菴先生雅屬

蔡元培

1930年，蔡元培為潘叔題写的条幅。